

## 新青年的新世界觀：

### 瞿秋白與辯證唯物主義

簡 金 生<sup>\*</sup>

#### 摘 要

在毛澤東思想指導下的馬克思主義史冊與歷史學研究裡，瞿秋白雖然是「正確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啟發者，但有著理論深度不足的缺點及革命路線上的「左傾」錯誤。瞿秋白只是唯物史觀與辯證唯物主義之間不佔有舉足輕重的角色，更核心的位置由毛澤東掌握。

本文認為，在中共創黨初期，瞿秋白在辯證唯物主義的理論素養是當時黨內所需。通過對辯證唯物主義理論的詳細分析，它確立從自然世界到人類社會與歷史一元式唯物論的起點，進而成為圓融的知識體系，提供黨人正確而堅實的世界觀與認識論。據此，辯證唯物主義消除自由意志與決定論的緊張關係。

於是瞿秋白能一方面清除各種「不正確」的馬克思主義競爭對手，另一方面通過參與當時知識菁英之間關於中國文明前途與科學主義的爭論，以此為馬克思主義在思想界取得撼動人心的地位。

關鍵詞：五四、瞿秋白、馬克思列寧主義、辯證唯物主義、歷史唯物主義

---

<sup>\*</sup> 作者現任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博士後研究人員。



# **New Youth's Worldview: Qu Qiubai and Dialectical Materialism**

Jian Jin-sheng

## **Abstract**

History and historiography of Marxism influenced by Mao Zedong's Thought see Qu Qiubai as a "correct" illuminator of Marxism-Leninism, but with insufficient theoretical depth and "left" errors of revolution line. With Mao Zedong at the central role, these studies allocate Qu Qiubai rather insignificant role in the phase between historical materialism and dialectical materialism.

This paper argues that Qu Qiubai's dialectical materialism was indispensable during the early years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Qu's theory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 confirms a theory of transformation from the physical world to human society and history, and further develops a material monism as a coherent frame of knowledge which provided the accurate and solid cosmology and epistemology for Chinese Bolsheviks. In this way, dialectical materialism resolved the tensions between free will and determinism.

Therefore, Qu Qiubai on the one hand purged the "incorrect" Marxists from the socialist circles. On the other hand, by participating

in the debates of the prospects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and scientism, Qu managed to promote Marxism as more effective ideology for “moving people’s hearts”.

Keywords: The May Fourth Movement, Qu Qiubai, Marxism-Leninism, dialectical materialism, historical materialism

## 新青年的新世界觀：

### 瞿秋白與辯證唯物主義<sup>\*</sup>

簡 金 生

#### 前言

1951年間，在黨政改造與重建的過程中，蔣介石（1887-1975）屢次向中央改造委員會與黨政高層提醒，必須徹底研究辯證法，對辯證法的學習尤須列為「黨員必修之課」，對辯證法的無知乃是「本黨之所以被共匪擊破也」，並要求「從速編輯本黨適用的三民主義辯證法」。<sup>1</sup>雖然蔣介石過去曾向賀麟（1902-1992）學習過黑格爾哲學，<sup>2</sup>只是在親自研究後，就他的自註來看，他是將辯證法當成理則學的一種，因此覺得共產黨引用辯證法是牽強與不通，還批評「唯物辯證法三律最不通的莫過於突變律」，乃自相矛盾。<sup>3</sup>實際上，對布爾什維克黨人而言，「突變律」的政治意義正在於其拒絕所有漸進的變化，包

---

\* 本文承蒙兩位匿名審查人糾謬攻錯，提出許多寶貴的修改意見，謹此特申謝悃。

<sup>1</sup> 秦孝儀主編：《總統蔣公大事長編初稿》（臺北：中國國民黨黨史委員會，1978年）第10卷，2月1日、2月8日條，頁28、40。

<sup>2</sup> 關於蔣介石與賀麟的關係，見黃克武：〈蔣介石與賀麟〉，《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67期（2010年3月），頁17-58。

<sup>3</sup> 秦孝儀主編：《總統蔣公大事長編初稿》第10卷，6月8日、6月10日條，頁149、150。

括社會進化論的觀點；凡是反對突變與革命者都是保守、庸俗、修正主義的一方。就此而言，與中國馬克思主義者<sup>4</sup>鬥爭一生的蔣介石，仍有其思想敏感度。

「官方」馬克思主義者最為核心的宇宙觀及一切革命戰略的思考，正是辯證唯物主義（dialectical materialism）與歷史唯物主義（historical materialism）。根據斯大林（Joseph Stalin，1879-1953）最終權威的見解，馬克思列寧主義（Marxism-Leninism）必須要區分為辯證唯物主義與歷史唯物主義。前者是「因為它對自然界現象的看法，它研究自然界現象的方法，它認識這些現象的方法，是辯證的」，而後者「是把辯證唯物主義原理推廣去研究社會生活，把辯證唯物主義原理應用於研究社會生活現象，應用於研究社會，應用於研究社會歷史」。<sup>5</sup>

<sup>4</sup> 在此先界定行文中幾個名詞的用法：當使用「馬克思」一詞時，所指的是馬克思（Karl Marx，1818-1883）本人的著作與思想。當使用到「馬克思主義」一詞時，所指的是自馬克思起、歷經恩格斯（Friedrich Engels，1820-1895）、正統馬克思主義（Orthodox Marxism）與第二國際、列寧主義與第三國際、西方馬克思主義（Western Marxism）以及眾多馬克思主義者對於馬克思的各種詮釋的總和。當使用「馬克思列寧主義」一詞時，專指以俄共布爾什維克黨為組織模式、並為其它地區所採行的共產革命運動下，所採用的革命理論。而「中國馬克思主義」一詞，指的是中國知識分子對馬克思主義的各種說明，與「馬克思主義」一詞的差異僅在於詮釋者限定為中國知識分子。正統馬克思主義的時代背景，是由於馬、恩之後的第二國際，關心的首要問題是如何將歷史唯物主義加以科學主義化，以使馬克思主義能一方面擴展至其他領域並解釋國際資本主義的最新發展局勢，另一方面要能建立屬於工人政黨之科學的政治理論與革命戰略。西方馬克思主義則興起於1920年代，與前一代正統馬克思主義集中關注經濟與政治的取向不同，從盧卡奇（Georg Lukacs，1885-1971）、科爾施（Karl Korsch，1886-1961）、葛蘭西（Antonio Gramsci，1891-1937）等人起，將馬克思理論援用於分析文化活動對社會結構的制約。見 Douglas Kellner, "Western Marxism," in Austin Harrington ed., *Modern Social Theory: An Introduction* (Oxford, U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154-174.

<sup>5</sup> 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聯共（布）中央特設委員會編：《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莫斯科：外國文書籍出版社，1949年），第4章第2節〈辯證唯物主義與歷史唯物主義〉，頁133。這個對馬克思列寧主義最權威的定義，經由《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在中國的傳布，配合毛澤東所發

在這樣的見解下，中國對於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正確認識，也要能夠總括這兩個面向。就中共黨史而言，早期的中國黨人，由於受限於認識水平和客觀條件，首先只將歷史唯物主義（或稱歷史唯物論、唯物史觀）的面向介紹到中國來。而後，經過黨人的不斷探索與俄國友黨的幫助，中國黨人逐漸地認識馬克思列寧主義的世界觀，亦即辯證唯物主義（即辯證唯物論、唯物辯證法）。

過去的先行研究指出，從晚清到五四時期，受到日本泛社會主義思潮影響的中國知識分子，他們首先認識到的馬克思主義，是比較強調「唯物史觀」的這個面向。唯物史觀不僅可以跟當時所流行的社會進化論相互補充，並且在中國受到資本主義影響後開始步入工業化的歷史過程中，透過唯物史觀對人類社會歷史進程的總概括，人們相信，正走向歷史另一個新階段的中國，也在唯物史觀法則的觀照下。因此，當時的社會主義者討論馬克思主義時，只談生產力、技術進步與政治經濟學的分析，而不談生產關係與階級衝突。同時，中共黨人也不會用辯證法來描述社會衝突。<sup>6</sup>

---

動的整風運動，成為所有中國黨人學習革命理論與黨史的教本。關於《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的傳布過程，見歐陽軍喜：〈論抗戰時期《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在中國的傳播及其對中國共產黨宣傳工作的影響〉，《黨史研究與教學》2008年第2期，頁22-30。

<sup>6</sup> Arif Dirlik, *Revolution and History: The Origins of Marxist Historiography in China, 1919-1937*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8), 22-36. 德國史家李博（Wolfgang Lippert, 1952-）通過對各語言間馬克思主義術語的考察，亦有類似的觀點，見李博著，趙倩、王草、葛平竹譯：《漢語中的馬克思主義術語的起源與作用：從詞彙——概念角度看日本和中國對馬克思主義的接受》（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3年），頁276、295。不過他認為中共黨人懂得使用唯物辯證法、辯證唯物論等詞，是1930年代翻譯西方文獻時才出現，這點有待商榷。如以下第二節的分析，瞿秋白在1923年時已經根據俄國馬克思主義文獻開始使用並傳布辯證唯物主義。Nick Knight 則是西方學者中少數注意到瞿秋白在引介辯證唯物主義的重要性，並給予不少篇幅的討論。見 Nick Knight, *Marxist Philosophy in China: From Qu Qiubai to Mao Zedong, 1923-1945* (Dordrecht: Springer, 2005), 29-69. 不過他並未特別討論瞿秋白參與當時知識界論戰的脈絡。本文認為，由於經過俄國馬克思列寧主義在知識與理論上的裝備，使得瞿秋

當中國共產黨在俄共的幫助下成立後，如何將中國的未來帶向更高一級的歷史，如何在對中國進行政治經濟學式的分析之餘，還能夠開始去制訂出一個適合中國社會的革命方略，這一點立刻成爲黨人們心中所盤算的重點。學自日本馬克思主義者政治經濟學式的分析，在國情不同的情況下，對中國這個還不夠充分資本主義化的國家，無法進行更深刻的分析。然而革命的情勢不能等待書齋中長路漫漫的知識研究，如何去定義群眾、尋求同盟、規定階級與制訂革命策略的問題是更加重要的。並且，在這些現實分析之上，還能提供一套全新的世界觀，武裝黨人的精神修養，防衛敵對思想的挑戰，爲革命事業指出一條必勝之路。

這個來自俄國的新世界觀，也就是「辯證唯物主義」，它是「列寧主義」(Leninism)的核心。20世紀初期，由於馬克思論斷資本主義必將貧困化的預言並未實現，歐洲的社會民主黨人與第二國際紛紛採取議會或修正路線。但在列寧(Vladimir Lenin, 1870-1924)看來，資本主義的最新發展反而在理論與實踐上驗證了馬克思主義關於革命必然性的論斷。這個批判的起點，是列寧的帝國主義論。帝國主義時代(也就是壟斷資本主義、金融資本主義)爲了延續資本積累，通過掠奪殖民地尋找原料與市場，從而將原本一國之內的「階級剝削」轉變爲全球性的「民族剝削」，金融資本主義的矛盾與壓迫性也就轉爲全球性，社會主義革命也就與民族解放運動結合。如此一來，帝國主義論不僅重新界定時間——歷史正從帝國主義階段邁向社會主義階段——；也重新界定地理空間——一方面是全球經濟的緊密結合，另一方面是不同地區的不均衡發展，表現爲先進國對落後國榨取超額利潤。既然帝國主義是全球性的，所以對革命的各種分析就只能奠

---

白能很從容地依據辯證唯物主義批判從文化保守主義者到主張西化的各種陣營，爲中國黨人示範如何在文化領域上進行爭奪。雖然辯證唯物主義不一定可以說服每一個人，但它提供一套完整圓融的體系，足以應對各方在理論上的挑戰。



基在國際的而非民族的。最先進國家的一切階級都是殖民剝削共犯，革命不再可能，而次殖民地本國資產階級實力軟弱。於是，資本主義的瓦解是發生在它全球鎖鍊中最脆弱的環節，資本主義世界的外圍，這就是1917年俄國革命的重大意義。<sup>7</sup>

既然帝國主義時代的戰爭證明，資本主義與民族國家業已失去繼續存在的價值，一切保守主義、自由主義與其他社會主義也不再有合法性，列寧主義由此提供整套取代資本主義的方案與意識形態。由於它的目標是直接對抗歐洲中心主義，帝國主義理論為受壓迫的殖民地與落後地區指出成為歷史進程主體的可能性。對後進國家知識分子來說，列寧主義為他們自身民族國家所受的屈辱提供歷史解釋。對受剝削的工農而言，列寧主義提出具有正義性的理論。受此鼓舞而展開的民族解放運動與階級革命，是全世界解放運動中毫無疑義的一部分。基於此，列寧主義堅決為其追隨者提供唯一的確定性哲學——辯證唯物主義——它主張從自然到社會的一切現象都遵循可知的法則，而辯證法能徹底認識一切變動不居現象的本質與相互關係。對追隨者而言，辯證法提供最核心的思想武器與自信，維持黨人的純潔與戰鬥性，抵禦一切意識形態的進攻。<sup>8</sup>

在中國，隨著中國黨走向布爾什維克化後，辯證唯物主義也跟著傳入。它是1923年起，受到留俄學生、特別是瞿秋白（1899-1935）的影響而在理論取向上，逐漸地轉向俄式唯物辯證法的馬克思列寧主義。這個法則在瞿秋白看來，是馬克思列寧主義中位階最高的本體論與世界觀，唯物史觀的任何分析，都必然地要從宇宙的自然辯證性中找到起點。如此一來，唯物之所以唯物，是因為人們相信辯證法則的最終必然性，服從法則也就等於彰顯黨人的自由意志，成為能夠創造

---

<sup>7</sup> 帝國主義理論的提出不始於列寧，但他的帝國主義論巧妙地綜合各家，得以使列寧主義能與各種社會主義思想區別出來，這裡的說明，見 Neil Harding, *Leninism* (Durham, N.C.: Duke University Press, 1996), 136-141.

<sup>8</sup> Neil Harding, *Leninism*, 1-14.

歷史的主體。這裡涉及到的問題，正是馬克思主義陣營內最重要的議題之一：如何詮釋歷史唯物論中決定論（determinism）與唯意志論（voluntarism）的對立。從馬克思本人起，這組對立不僅涉及共產主義者如何提出解釋社會變遷的歷史理論，更觸及如何進行革命實踐、評估行動的可能性與限制。以馬克思的話來說：「人們自己創造自己的歷史，但是他們並不是隨心所欲地創造，並不是在他們自己選定的條件下創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從過去繼承下來的條件下創造。」<sup>9</sup>也就是說，能動的主體必須先接受結構性的制約，然而結構性的制約最終必會觸及到命定的目的論。故此，過度的歷史唯物論傾向於認為結構的制約大於主體能動性，從而導向目的論的困境。反之，極端的唯意志論爲了反對目的論卻誇大行動者塑造歷史的力量，從而忽視結構對行動者的制約。<sup>10</sup>

對辯證唯物主義而言，結構的限制確實是第一位，能動的主體，儘管有限，卻能作用於結構，影響歷史的進程。要達到這個認識，就必須從本體論與認識論上確立辯證法，從而「科學」地理解世界與歷史，進而預知未來。既然辯證法是掌握真理的唯一媒介，它的「正確」詮釋對領導人來說就至關重要，才能被追隨者相信其權威性。由於日後中國的馬克思列寧主義最終權威是由毛澤東思想所確立，據此回顧中國認識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歷史過程，就可以分爲三個大階段：1919至1927年的階段是唯物史觀傳播的時期；1927至1937年則加入唯物辯證法，並且開始系統化的時期；最後，1937至1949年的階段，由毛澤東思想所領導的黨，充分地將馬克思主義具體地應用於中國現實狀況，得到最終的革命勝利。而瞿秋白一般就被視爲第一到第

<sup>9</sup> 馬克思著，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史達林著作編譯局譯：《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北京：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年），頁8-9。

<sup>10</sup> Alex Callinicos 著，簡守邦譯：《社會理論思想史導論》（臺北：韋伯文化出版公司，2004年），頁130-131。（譯自：Alex Callinicos, *Social Theory: An Historical Introduction.*）

二階段的重要引渡人。<sup>11</sup>

事實上瞿秋白在時序上，比斯大林更早對馬克思列寧主義作出辯證唯物主義與歷史唯物主義的這個區分。當然，他的體系是得自俄國馬克思主義者。瞿秋白也十分清楚，面對五四時代思想界多元繽紛的各種主義，已經掌握共產黨人最高世界觀的他，將有能力在各場論戰中一一擊破對手。就馬克思主義的陣營來說，除了黨內尚未歸順在辯證法權威下的黨人外，各式無政府主義與社會主義已是假老虎；就思想的社會面而論，要為馬克思主義在中國思想界競逐，首要的就是掃除一切保守主義與西化派提倡的人生觀，展示辯證法所指出的必然世界，這就為此後黨人示範辯證法的威力。

對於中國馬克思主義者為什麼會接受唯物辯證法，一個可能的解釋在於，辯證法對於中國思想因素而言並不是不相容的因子，同時，中國知識分子習於一元論式的整體思想模式，<sup>12</sup> 並且強調主體意志的客觀化實踐對於外在世界的主動性。<sup>13</sup> 然而，本文不欲採取新瓶裝舊

---

<sup>11</sup> 如丁守和：《瞿秋白思想研究》（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頁127；鄧中好：《瞿秋白哲學研究》（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1992年），頁19；李其駒、王炯華、張耀先主編：《馬克思主義哲學在中國——從清末民初到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利興民主編：《馬克思主義哲學在中國的傳播和發展》（廣州：廣東高等教育出版社，1988年）；莊福齡主編：《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傳播史》（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88年）；曾樂山：《馬克思主義哲學的中國化及其歷程》（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1991年）等著作。

<sup>12</sup> 其實就瞿秋白而言，他的思維模式就非一元論，即使是成為黨內首席理論家與領導人，脫胎於士紳階層、游移於淑世與避世對立的「二元的人生觀」仍迴盪在他的內心深處。一個理應有著黨人堅定修養的馬克思主義者，竟是「脆弱的二元人物」，十足顯示此種矛盾有多麼「辯證」了。瞿秋白的自述，見瞿秋白：〈多餘的話〉，《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論篇），卷7（北京：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頁701-703。

<sup>13</sup> 金觀濤：〈中國文化的烏托邦精神〉，《〈香港〉二十一世紀》總第2期（1990年12月），頁17-32；金觀濤：〈〈實踐論〉與馬列主義儒家化〉，《〈香港〉二十一世紀》總第20期（1993年12月），頁19-28；金觀濤：〈唯物史觀與近代中國傳統〉，《〈香港〉二十一世紀》總第33期（1996年2月），頁53-61。

酒的取徑，而是從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出發，釐清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傳布過程中的這個重要轉向。首先，分析瞿秋白如何以不同先前黨人的闡釋方式重建歷史唯物主義。其次，詳細考察瞿秋白對辯證法的掌握，以及他如何回應自由意志與決定論的兩難。第三，通過《新青年》參與文化領域的競逐，向五四時期新一代知識青年證明辯證法無可撼動的權威。最後，藉由簡短回顧1928年之後辯證唯物主義的發展，對照指出，雖然瞿秋白為黨人示範辯證法的威力，然而面對更新、更權威的官方版本，瞿秋白的體系成爲被否定的一方。

## 一、歷史唯物主義

五四前後，時人所理解的馬克思主義大半得自日文的中介，即使是中共主要領導人亦如此。<sup>14</sup> 以李大釗（1888-1927）爲例，馬克思主義等於唯物史觀，可以與社會進化論相互發明，並透過階級競爭這條金線來貫穿。<sup>15</sup> 只是面對知識界對馬克思主義的攻擊，李大釗同意，唯物主義所規定的歷史必然性與階級鬥爭所指向的人爲革命之間，是有些「牽強矛盾」之處。爲了替階級鬥爭這個抹除倫理道德的邪惡因素作一合理詮釋，李大釗從互助的、倫理的觀念來解釋，馬克思並沒有拋棄道德這個重要成分。<sup>16</sup> 李大釗對唯物史觀隱含著抹煞人類心智自由的宿命論與沒有倫理涵養的一面，給予他個人的解釋。顯然地，李大釗採取想像性的詮釋以避免馬克思主義的教條化，糾正沒有心靈的唯物取向。<sup>17</sup> 如果李大釗可以繼續接觸馬克思本人著作的話，那麼

<sup>14</sup> 石川禎浩著，袁廣泉譯：《中國共產黨成立史》（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6年），頁6-55。

<sup>15</sup> 李大釗：〈我的馬克思主義觀（上）〉，《新青年》第6卷第5期，1919年5月，頁523-524。

<sup>16</sup> 李大釗：〈我的馬克思主義觀（上）〉，頁533-537。

<sup>17</sup> 限於篇幅，無法細緻討論李大釗對馬克思主義的理論認識。對此，Maurice Meisner有詳盡的研究。他認爲李大釗思想中本來就有強烈的唯意志論色彩，因此在轉向馬克思主義後，他引入無政府主義者克魯泡特金

一個可能免除誤解的方式，或者是以抽象的「勞動」概念來釐清馬克思的唯物主義，而不是再度以腦中的思維來想像人、社會或歷史應該是唯心還是唯物的這種二分法；或者，採取俄共的唯物辯證法來溝通唯物史觀與階級鬥爭在理論上所引起的衝突。後者正是瞿秋白的取向。

1922年12月底，在共產國際第四次代表大會結束後，瞿秋白隨陳獨秀返國。除了擔任鮑羅廷（Michael Borodin, 1884-1951）的助手、執行國共合作的任務之外，另一方面就是為黨人提升理論高度，負責主編《新青年》、《前鋒》與《嚮導》等刊物。在共產國際的支助下，陳獨秀於1923年6月將《新青年》遷至廣州改為季刊出版，<sup>18</sup>至1926年7月停刊，九期中瞿秋白主編七期，共在上發表文章27篇。作為共產國際培育的第一代職業革命家，瞿秋白的工作是將列寧主義引入中國，成為黨人革命工作的指導，創建新的世界觀，驅除一切非正統的馬克思主義，並對抗所有敵對的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論述。

《新青年》改頭換面的第一期，面對當時各種品牌的無政府主義與社會主義思潮，瞿秋白向中國各界打出「正牌」共產主義的黨綱與策略，強調這是馬克思派與其他各種社會主義之間最顯著的區

---

（P. Kropotkin, 1842-1921）的互助思想，用以彌補唯物史觀過於重視下層結構的作用，從而忽略人的意識與行動力，見 Maurice Meisner, *Li Ta-chao and the Origins of Chinese Marxism*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7), 140-149。Arif Dirlik 並不同意 Meisner 的判斷，認為無政府主義的思想一直是李大釗與同一輩人共同的重要思想資源，見 Arif Dirlik, *The Origins of Chinese Communism* (Oxford: University of Oxford Press, 1989), 45-52。無論如何，此處要指出的是，李大釗是通過非馬克思主義的路徑來化解決定論與意志論的衝突。

<sup>18</sup> 關於《新青年》如何從同人刊物轉變為宣傳馬克思主義的機關刊物，以及共產國際在經濟上的支持，見歐陽哲生：〈《新青年》編輯演變之歷史考辨——以1920-1921年同人書信為中心的探討〉，《歷史研究》2009年第3期，頁80-104。（編按：《新青年》計出11卷，共63期，其中前9卷為月刊，第10卷為季刊，第11卷為不定期刊。為區別轉向黨刊後的思想改變，《新青年》第10卷或稱為季刊，本集刊則採接續卷期的方式，如，《新青年》季刊第1期，則標註為《新青年》第10卷第1期。）

別。因為只有共產主義者才有真正的理論與方法，「能用社會科學的方法深察世界社會中之動象」。<sup>19</sup> 在瞿秋白回國之前，黨人已進行過這種敵我判別的鬥爭，<sup>20</sup> 而瞿秋白與黨人們的不同之處是，他抨擊第二國際黨綱失去馬克思主義的「辯證法的唯物論」(Materialisme Dialectique)。<sup>21</sup> 這是瞿秋白首度提出此名詞，但僅止於此，並未作任何說明。直到一年多後的《新青年》第10卷第3期，才有兩篇譯文向讀者解釋何謂辯證法。在〈辯證法與邏輯〉一文裡，直言之，馬克思、恩格斯的哲學不只是唯物論，也是辯證法。辯證法遠比形式邏輯強大，前者可以描述物質的全部運動過程，運動即是矛盾，它揭示物質的性質並非固定而是變化的，當數量達到一定界限，物質就會消失原本的某一特性，或獲得另一特性。<sup>22</sup> 然而，由於這篇文章是普列漢諾夫(Georgii Valentinovich Plekhanov, 1856-1918)針對第二國際黨人引入新康德主義哲學的征戰，應不會有太多中國讀者能理解普列漢諾夫此文的脈絡。至於另一篇譯文，雖提出辯證法有三個規律，但一方面深度完全不及上篇，就內容正確性而論亦有錯誤。<sup>23</sup>

<sup>19</sup> 瞿秋白：〈世界的社會改造與共產國際（共產國際之黨綱問題）〉，《新青年》第10卷第1期，1923年6月15日，頁17-18。

<sup>20</sup> Arif Dirlik, *The Origins of Chinese Communism*, 225-245.

<sup>21</sup> 瞿秋白：〈世界的社會改造與共產國際（共產國際之黨綱問題）〉，頁28。此文後收於瞿秋白自編的《瞿秋白論文集》（1927年，未出版）。本文使用版本：瞿秋白著，瞿勃、杜魏華整理：《瞿秋白論文集》（重慶：重慶出版社，1995年），該書將文字易為「互辯法的唯物論」。

<sup>22</sup> 蒲列哈諾夫(Plekhanov)著，鄭超麟譯：〈辯證法與邏輯〉，《新青年》第10卷第3期（1924年8月1日），頁38-46。按，蒲列哈諾夫現通譯為普列漢諾夫(Georgii Valentinovich Plekhanov, 1856-1918)。這篇文章是節選自普氏〈費爾巴哈與德國古典哲學的終結〉第二版序言一文。據選集編輯說明，〈辯證法與邏輯〉一文原刊於普氏《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問題》俄文單行版作為附錄，冠以「辯證法和邏輯」的標題。見中國人民大學編譯室譯：《普列漢諾夫哲學著作選集》第3卷（北京：三聯書店，1962年），頁79-93、810。

<sup>23</sup> 阿多那斯基著，石夫節譯：〈馬克思主義辯證法底幾個規律〉，《新青年》第10卷第3期，1924年8月1日，頁46-50。此文是來自：V. Adorsloky著，石夫節譯：〈馬克思主義辯證法底幾個規律〉，《少年》1923年第7期

自此之後，瞿秋白於《新青年》上就不再提到過「辯證法」，這並不表示他放棄闡述此一世界觀。實際上在同一時間裡，他一方面以辯證法為武器，隨同陳獨秀出戰科學與人生觀的辯論；另一方面，他在上海的課室內直接面對青年爭取革命的「領導權」(Hegemony)。<sup>24</sup>在投身黨務工作之餘，瞿秋白自1923年8月起在上海大學社會系任教。為教學之便，開始有系統地編譯馬克思主義理論的教材，主編《社會科學講義》數冊，先後完成《現代社會學》、《社會哲學概論》、<sup>25</sup>《社會科學概論》<sup>26</sup>等。在這些編譯教材裡，他將辯證法改稱「互辯法」，並做進一步的解釋。

要真正理解辯證法，得先從人類與自然、人與社會的關係開始說起。瞿秋白全然不同於先前黨人對「唯物主義」的闡釋，所謂的唯物，必須從整體社會中人類的「勞動」作為考察的起點。

---

(巴黎)，頁24-29，但作者有待考證。

<sup>24</sup> 這個英文單字，瞿秋白是在《中國革命中之爭論問題》一文的前言中首次附上，見瞿秋白：《中國革命中之爭論問題》，收於《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論篇)卷4(北京：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頁435。

<sup>25</sup> 《社會科學講義》共四集，分《現代社會學》、《現代經濟學》、《社會運動史》、《社會思想史》、《社會問題》、《社會哲學概論》等六部分，其中《現代社會學》、《社會哲學概論》為他所編譯。《社會科學講義》1924年1到4月間由上海書店印行，同年3到6月再版，1927年1月再由漢口長江書店重版。見周永祥：《瞿秋白年譜新編》(上海：學林出版社，1992年)，頁113。目前尚不清楚《社會哲學概論》(完成於1923年)的寫作依據，依內容判斷，是雜揉自普列漢諾夫的作品。又，根據《瞿秋白譯文集》編者的說明，《現代社會學》(完成於1924年2月)一書是依據布哈林(Nikolai Ivanovich Bukharin, 1888-1938)《歷史唯物主義理論》一書編寫而成。《現代社會學》除第一章外，其餘二到五章基本上是《歷史唯物主義理論》一書第一章到第四章內容的意譯，見鄭惠、瞿勃編：《瞿秋白譯文集》(南京：譯林出版社，1999年)下冊，頁154的編者說明。

<sup>26</sup> 《社會科學概論》一書完成於1924年6月18日。本年夏，上海大學通過上海學生聯合會，聯合復旦大學、南洋大學(後改為交通大學)、東吳大學法科等的高等學校，於7月6日到8月31日在上海大學共同舉辦夏令講學會，而《社會科學概論》與此時所寫的〈新經濟政策〉，則是瞿秋白在夏令講學會上的講稿。此後《社會科學概論》一書不僅多次再版，為躲避官方查禁，亦更改書名與作者。見周永祥：《瞿秋白年譜新編》，頁126-128。

社會乃是「社會者能製造工具的人類之勞動結合也。此勞動結合——『經濟體』之演化，乃生政治、法律、道德、宗教、哲學、風俗、藝術、科學等現象，以應組織勞動之需。」<sup>27</sup> 人們因勞動改造自然界，這過程便是所謂生產。生產活動促使人對自然實行生存競爭，爲了戰勝自然，人必須互助結合，故勞動必定是社會性。在以人力改變自然界的過程中，生產方法日益複雜，也因經驗累積而產生智識、語言與思想，這表示人的意識活動得來自生產過程的活動。<sup>28</sup>

透過勞動的結合，人與自然關係的變化隨之改變了人與人的社會關係，「人對自然的關係便是勞動方法及其生產量」，「人與人之關係便是社會內協作及分工的方式」，也就是生產力與生產關係。隨著社會對自然的關係發生變動，社會內人與人的關係亦隨之變動，於是社會依據生產材料與生產工具的佔有方式而出現階級關係。<sup>29</sup>

由於自然環境與人種的不同，生產力的適應方式因而不同，從而形成各種社會制度，據此可以將人類歷史分爲原始共產制、宗法社會制、奴隸制或農奴制（封建）、資本主義及共產制度。<sup>30</sup> 但必須要牢記，各個歷史分期並非絕對地一路承繼，各階段也都有種種的過渡形式。譬如資本主義內有商業資本、工業資本、財政資本（即爲列寧所說的金融資本）三個階段，商業資本是封建制度與資本主義之間的過渡形式，而財政資本（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與共產主義之間的過渡。<sup>31</sup> 總的來說，每一個階段都是前一階段發展之果，後一個階段發

---

<sup>27</sup> 《社會科學概論》，收於《瞿秋白論文集》，頁910。

<sup>28</sup> 《社會科學概論》，頁902-904。

<sup>29</sup> 《社會科學概論》，頁906-907。

<sup>30</sup> 《社會科學概論》，頁910-914。就此而言，自然環境與人種的決定性甚至比生產力更爲優先，將導向地理決定論，如此一來即違反歷史唯物主義。實際上瞿秋白這個概念是來自普列漢諾夫，後者過於強調地理環境的影響，見普列漢諾夫：《論一元論歷史觀之發展》，收於中國人民大學編譯室譯：《普列漢諾夫哲學著作選集》第1卷（北京：三聯書店，1962年），頁680-682、766。

<sup>31</sup> 《社會科學概論》，頁915。



展之因，每一個大階段的開始與終結，都必須經歷過一種革命的「突變」。同時因為自然條件之不同，各地在資本主義未到來之前都是自成一社會。直到資本主義的發生，從而導致各種社會成為整個世界社會一部分的時候，這時，各種社會形式的互相接觸，就會演變成複合形式。<sup>32</sup> 因為有了過渡形式與複合形式，所以可以解釋目前無產階級革命不是發生在資本主義最先進的英、美，而是由俄國率先領導。必須瞭解到俄國無產階級在複合過渡形式中，恰好處於世界資產階級最弱的地方，易於開展社會革命，而勝利後難於社會主義之實行，反之，資本主義較強盛的地方則是難於社會革命的開展，勝利後就容易實行社會主義。<sup>33</sup>

除了物質的工具之外，精神的工具亦是人類勞動過程經驗所得，是維持社會共同生活所必須的方法。但在階級社會裡，這些社會的工具卻成了治者階級剝削受治階級的種種手段，於是發現宗教、政治、法律、道德、智識、藝術、風俗、習慣。<sup>34</sup> 這就是從基礎建築到上層建築的通路。

他將上層建築分為三層：第一是包括政治、法律等的社會制度。第二是道德、風俗、宗教、藝術的社會心理，反映普遍民眾所認為當然的、美好的（也就是不得不的與願意要的）種種觀念。最上面是包括哲學、科學在內的社會思想，它是社會心理有系統的綜合反映，是一個時代的思想方法（時代邏輯），以及對於宇宙和社會現象的解釋，也就是人生觀與宇宙觀。<sup>35</sup>

經濟基礎制約上層建築，所以社會心理與社會思想本來都是共同的勞動經驗中得出的副產品，但在各種形態的階級社會裡，它們就從

---

<sup>32</sup> 他舉例，譬如中國的宗法社會與小商業社會遇到國際帝國主義的滲入，便成了「新封建軍閥加帝國主義經濟」的複合形式，見《社會科學概論》，頁915。

<sup>33</sup> 《社會科學概論》，頁916。

<sup>34</sup> 《社會科學概論》，頁908-910。

<sup>35</sup> 《社會科學概論》，頁944、926-927。

附屬地位獨立出來，有如超越時空的永久與絕對。治者階級在政治、法律的強力之外，又造出道德規範去蒙蔽受治階級。<sup>36</sup> 如此一來，瞿秋白就可將人類歷史的社會結構以一圖式勾勒出來：生產力、經濟關係、社會制度、社會心理、社會思想。<sup>37</sup>

可以發現，與李大釗相較，瞿秋白所說的道德，不是脫離於人的生產活動之外，這表示當社會進化到社會主義時代時，是不需由少數菁英凌駕在群眾之上，由上而下去創造一個新的道德倫理來協助經濟制度的變動。如果說階級社會裡，統治階級爲了安撫被統治階級，而把人的道德自律當成是人爲了獲得自由意志而所必須的；那麼依照瞿秋白的意思，在共產主義社會裡的道德，是與帶有階級性的道德不同。因爲人類可以真正「統治自然界的『自然性』，並且消滅社會裡的『自然性』」，<sup>38</sup> 也就是說，爲了生存，人可以克服自然界對人的限制，並且這種人和自然之間的物質轉換，是由聯合起來的生產者共同控制，而不是產生一種階級社會的對立力量來統治人們自己，從而「歷史的發展完全可以受人的規劃，人的意志方得自由」。<sup>39</sup>

最後他總括地指出：「歷史的（社會的）唯物論的根據」是將生產力的狀態視爲解釋社會最根本的原因，也就是社會結構內的物質成分，它是人與自然接觸點。<sup>40</sup> 政治、思想只能做經濟「數量」上變動的助力，卻不是經濟「性質」上變動的動因。

不過，如上所述，以人的勞動爲出發點的「歷史的（社會的）唯物論」的論證，只說明了社會存在於自然界中，卻沒有說明社會「生長」在自然界裡，也就是能完滿地解釋自然界的物質現象如何發展成

---

<sup>36</sup> 《社會科學概論》，頁926-927。

<sup>37</sup> 《社會科學概論》，頁944。同樣地，這個從下層到上層的歷史唯物主義公式，是來自普列漢諾夫，見普列漢諾夫：《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問題》（1907），《普列漢諾夫哲學著作選集》第3卷，頁195。

<sup>38</sup> 《社會科學概論》，頁948。

<sup>39</sup> 《社會科學概論》，頁948。

<sup>40</sup> 《社會科學概論》，頁944-945。

社會現象的因果。要如何再一以貫之地從自然界到社會都可以用唯物論來總結出公律，這就需要立於辯證法這個人類思維方式最高點的座標上才能做到。

## 二、辯證唯物主義

社會科學是整體地由下層到上層將社會現象的秘密加以分析，這是歷史唯物主義的路徑；而社會哲學則是從上到下支撐著正確的宇宙觀和認識論，也就是辯證唯物主義：

馬克思主義，通常以為是馬克思的經濟學說，或者階級鬥爭論，如此而已。其實這是大錯特錯的。馬克思主義是對於宇宙觀、自然觀、人類社會之統一的觀點，統一的方法。何以馬克思主義的宇宙觀及社會觀是統一的呢？因為他對於現實世界裡的一切現象，都以「現代的」或互辯法的（*dialectique*）——即第亞力克諦的唯物論觀點去解釋。這是馬克思主義的最根本的基礎，就是所謂馬克思的哲學。<sup>41</sup>

互辯法的唯物論統一解釋宇宙的、自然的與人類社會的一切現象，所以只要掌握辯證的唯物哲學，它便是保證一切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的理論方向是正確的不二法門。以此為準，自然科學中只要是採取唯物論的觀點，那麼便可以跟馬克思主義聯絡，反之則是敵對的立場。而解釋社會現象的科學，便是歷史唯物主義的任務。

那麼，什麼是唯物論？什麼又是唯心論？他引用普列漢諾夫的話說：

唯心論對於一切宇宙現象，一切物質的性質，都以「精

---

<sup>41</sup> 瞿秋白：〈馬克思主義之意義〉（1926年1月），收於《瞿秋白論文集》，頁965。

神」……為原因來解釋。唯物論的方法，是用物質的種種性質，人類或動物機體的種種組織來解釋心理現象。凡是以物質為最初動力（原素）的哲學家都是唯物論派；凡是以精神為最初動力的哲學家便是唯心論派。<sup>42</sup>

要知道為什麼會有這樣的區別，那麼就必須從哲學史，也就是從古至今人們智識的歷程來考察起。

瞿秋白在《社會哲學概論》的緒言首先便指出，哲學，是求得宇宙綜合一貫的一切智識的總稱，所以它會追問到，人如何認識世界（宇宙），而這種認識又如何能保證是正確反映現實。他將哲學上對人類認識能力的解答，簡化為兩種對立關係——我與非我、認識與實質、靈魂與自然。接下來從哲學史開始回顧，為了回答宇宙的根本是什麼的這個問題，通常歷來思想家有兩種回答：一是唯物論的，都從客觀（或是實質、自然）出發；另一種就是唯心論的，是從主觀（或是意識、靈魂）出發；另外有些思想不能一以貫之的可歸類為折衷派與批評派。<sup>43</sup>

區別出立場後，就可以對物質與精神下定義。所謂的物質，就是凡能用我們外部的感覺去接觸，並且有份量、體積等可以稱量的東西；而精神，則是所謂的內心，這只能通過物質的現象去推測。<sup>44</sup> 為了證明宇宙的一切是統一於物質，他引用物理學對電子、原子的發現

---

<sup>42</sup> 瞿秋白：〈唯物論的宇宙觀概說〉（1926年1月），收於《瞿秋白論文集》，頁951。這種從哲學史兩軍對陣的分判作為寫作起點的策略，是此後中國左派多數闡釋唯物辯證法著作必不可缺的套路。瞿秋白所引普列漢諾夫文字，出自普列漢諾夫：《論一元論歷史觀之發展》，頁569-570。而普列漢諾夫又是依據恩格斯《路德維希·費爾巴哈和德國古典哲學的終結》一書的論述而來，見恩格斯：《路德維希·費爾巴哈和德國古典哲學的終結》，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編譯局編：《馬克思恩格斯選集》（北京：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卷4，頁224。

<sup>43</sup> 瞿秋白：《社會哲學概論》，收於《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論篇）（北京：北京人民出版社，1988年）卷2，頁310-312。

<sup>44</sup> 〈唯物論的宇宙觀概說〉，頁952。

來證明：宇宙追根究柢必然是物質一元的，除物質之外別無所有。既然確定一元唯物論的這個方向；接著，瞿秋白從宇宙的起源開始追溯起，到太陽系、地球的出現，這首先證明世界是處於不斷發展的變動狀態，顯現了物質的能變性。而後隨著地球的形成與生命的基本原素——蛋白質——出現後，生物界便一步步地展開其演化的歷史，這已經被達爾文的進化論（機體發展論）所證實。最後終於有從類人猿到人類的出現，一切生物都是物質這個宇宙間唯一的終極原素的各種組織和結構。<sup>45</sup> 瞿秋白的這種論述，都可以從恩格斯《自然辯證法》一書中找到，瞿秋白的工作是簡化了《自然辯證法》的篇幅。

自然世界的物質發展史是如此，那麼心理現象呢？它是統一的物質世界之另一種特別的現象。人或動物與環境的接觸就是其產生「自我感覺」的總因，靠著神經系統的反射作用，動物與人因而可以有知覺、有意識，而後才進一步複雜化和綜合化。這也就是說同一個東西是具有兩面性，在客觀上來說是物質的變化，就是外觀；而在主觀上來說就是心理的動作，就是內省、認識。所以「沒有離物質而獨立的精神」，同時「物質的狀態能決定精神的狀態」。<sup>46</sup> 唯物論判定真理的與否，便是精神、觀念是否與外界的物質相符合。自宇宙的誕生起，人自己是自然界的產物，與自然界相適應，那麼產生意識的腦神經也當然是自然的產物，必然地與自然界相適應，而不是相對抗。<sup>47</sup>

由恩格斯確立的自然辯證觀，可以用來解釋人類社會的歷史發展和其目的，從宇宙、自然界到人類社會與歷史，都可以找到一個必然會發生的法則，而這個法則是不以人的意志而轉移的。在這個意義之下，所謂的自由與必然，指的是認識到自然界有其內在法則的必然性，人類在必然性還沒有被了解的時候，只是以盲目的性質存在於世界，這如同原始人對其周遭的世界充滿無知一般。只有當人們能夠認

<sup>45</sup> 〈唯物論的宇宙觀概說〉，頁952-959；《社會哲學概論》，頁340-346。

<sup>46</sup> 〈唯物論的宇宙觀概說〉，頁960。

<sup>47</sup> 〈唯物論的宇宙觀概說〉，頁960-962；《社會哲學概論》，頁346-348。

識到那必然會發生的法則，認識到這個蘊含於宇宙和歷史的內在規律，這時候人的自由就發生了。<sup>48</sup>

瞿秋白亦是遵循同樣的格式，表明人類是依著必然的科學公律而發展，並非是那「自由」的高尚理想之創造，五四時代所標舉的個體自由在這裡以不同的方式出現。對於自然界及社會關係，唯物辯證法認為，只有在經過研究之後得到種種因果聯繫的公律，人才能脫離對自然與社會的盲目無知，於是才能因為通曉公律而後運用公律，去應付環境解決問題以達於自己的目的。所以「自由的意義在於能自治治物。人愈發展，愈能知悉客觀的公律，愈能支配自然界，他就愈自由；人類的自由不過是歷史發展的必然結果」。<sup>49</sup>不過五四所說的自由，是指向社會整體與個體的對立，當個體從傳統的解放中得到自由的個性，將阻礙國民性格自由發展的惡因子去除之後，中國才能有新的國民與新的民族國家；但是瞿秋白轉換對象，對立的兩者變成人與整個宇宙，阻礙人對自由的獲得變成人自身對於宇宙本源是否有真實的認識，自由將隨著自然與社會的歷史開展而必然性地來到，人也因對必然的了解而後獲得自由。換言之，人自不自由必須從人了解他自身對宇宙處境的關係來著手，此後才能談解放所必須的條件。<sup>50</sup>將此點放在現今資本主義社會看待，這就是「科學的社會主義必然要實現的保證；新社會的理想決不在於幾個思想家想出什麼正義人道出來，而在於群眾明白認識自己的地位」。<sup>51</sup>

<sup>48</sup> 恩格斯的這個觀點，最經典的敘述在：《反杜林論》，《馬克思恩格斯選集》卷3，頁454-456。

<sup>49</sup> 《社會哲學概論》，頁353。

<sup>50</sup> 金觀濤、劉青峰指出，近代中國的「個人觀」經歷向西方學習和中國常識理性重構的階段。在新文化運動初期，知識分子高舉個人自由，目標是批判儒家倫理。但到後期，多數團體與政黨開始從不同的立場走向否定「個人主義」，包括陳獨秀在內的中國馬克思主義者正是如此。見金觀濤、劉青峰：〈中國個人觀念的起源、演變及其形態初探〉，收於金觀濤、劉青峰：《觀念史研究：中國現代重要政治術語的形成》（香港：香港中文大學當代中國文化研究中心，2008年），頁147-174。

<sup>51</sup> 《社會哲學概論》，頁362。

探求物理世界的科學公律是科學的責任，而確定唯物這個根本觀念，以便綜合科學的種種公律，這就是哲學的功用，<sup>52</sup> 哲學因此成爲科學方向正不正確的後設基準。接下來瞿秋白根據《反杜林論》來介紹辯證法的三條公式：首先就是確立宇宙現象的根本是「物質的動」，動的本身就是矛盾，極簡單的機械運動便是矛盾的歷程，從而運轉了生物界的動與矛盾，表現在現今的社會現象裡就是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的矛盾，並轉向社會主義的發展。第二和第三就是質量互變與否定的否定。當宇宙與社會裡一切數量漸漸累積，發展到一定程度後，就必定會產生質量的變，這種質變又是所謂的否定的否定，改變了其自身原本的狀態。統一對立是辯證法最重要的第一定理，它保證了辯證之所以可以存在的根本依據，有了這個本體後，事物才能有量變到質變的可能，產生質變後的事物就否定自身原來的狀態，向另一個新的形式過渡。物質自身就因爲辯證的不斷發展與不斷否定自身，從而宇宙、自然、社會就不斷地從初級向更高的形式過渡。唯物的自然辯證法就以全知全能的地位如鐵一般地保證了世界運行的一切規則，而後由馬克思主義的唯物辯證法所指出，現在人們的任務就是積極地去學習這個宇宙觀。<sup>53</sup>

---

<sup>52</sup> 《社會哲學概論》，頁354。

<sup>53</sup> 對辯證法公式的進一步闡釋，在《社會哲學概論》一書中篇幅不大。瞿秋白是在依照布哈林觀點編譯的《現代社會學》以專章介紹（見《現代社會學》，收於《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論篇〕卷2，頁455-461）。在當時布哈林得勢時雖無疑問，然而不到3年，隨著布哈林的失勢，建立在「均衡論」的布哈林體系，就可以引導出取消辯證法的危險。簡言之，若主張萬物處於均衡狀態，是依外力的方向而運動，這將拋棄辯證法第一定律（事物的內在矛盾是一切發展的最優先性），於是也看不見質變律與否定之否定律。瞿秋白後來是否有意識到這問題呢？比較可能的時間點，是1928年4月他赴俄後。在1930年代唯物辯證法論戰展開後，他曾穩守當時俄共官方的最新體系，以〈唯物辯證法的合法主義化〉一文批判托派的觀點。只是此文並未公開發表。見〈唯物辯證法的合法主義化〉（1932年5月31日），收於《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論篇）卷7，頁506-521。不論如何，就下一節所分析的論戰脈絡下，此處依《社會哲學概論》一文的觀點來討論瞿秋白的看法已經足矣。

有了哲學方面的總體說明，得到宇宙真實本體的最高律則，應用在自然科學上就可以證明自然的規律，而社會科學就由馬克思主義的唯物史觀來證明，於是一個完整且自我圓滿的體系便出現了。瞿秋白總結這個體系，科學的共產主義是馬克思主義四部分中的最後結論，而前三部分依次就是互辯法唯物論、唯物史觀、無產階級經濟學。這個體系，從「實踐」上或「目的」上來說：因為共產主義是當初形成馬克思主義的動機，也就是世界無產階級的困迫窘境與其力求解放的鬥爭。但是，人類社會的進化受到資本主義發展的阻礙，使得馬克思、恩格斯當初見著這種社會潮流，經過研究後便確定了共產主義是目的所在。然而無產階級鬥爭的根源是和社會經濟的發展密切相關，所以進一步去探求資本主義社會的秘密，而發生了馬克思主義的經濟學。但資本主義社會又不是憑空得來，而是和整個社會進化有密切相關，因而產生了唯物史觀的社會學，或歷史唯物論。研究社會又絕不能和自然界的研究所分離，因為人類社會生存於自然界，人對自然的關係同時也是社會中人與人的關係，所以有了對一切科學方法產生綜合的需要，進入於哲學上的問題，也就是互辯法的唯物論。反過來推論，這樣的系統在「方法」上來說亦是以唯物論一以貫之的。<sup>54</sup>

<sup>54</sup> 〈馬克思主義之意義〉，頁966-968。在分析瞿秋白所認知的辯證法後，在此簡要地回應兩個問題：馬克思本人是如何看待辯證法？以及這個自然辯證法是如何成為馬克思主義的基磐。對馬克思而言，辯證法就只是思維的表現方式。它是人在研究現實的過程中，透過思維在觀念上對經驗材料的加工，而後將這個被理解的研究對象給表現出來的一種方法。一方面，客觀世界只有經過人在概念上的加工過程後才能被人所理解，客觀世界本身不會把自己的內在本質直接地表現給人認識；另一方面，這種透過人主動地對對象所建構出來的觀念，也只是研究後的產物，它決不會以黑格爾「絕對精神」的方式來取消客體世界的存在。所以，辯證這個思維的表現方式，就只能是屬於主體在思維中的辯證，也就只能是唯心的辯證，它是人自己思想的過程。若要化約馬克思對人類獲取知識方法的看法，或者是簡化問題，如同恩格斯的作法，去追問意識與物質兩者的優先性，這並沒有意義。一方面，沒有存在物的優先性，就沒有人的認識對象可言。但這並不是說存在（物質）先於認識（意識）。另一方面，沒有主體認識能力的優先性，那麼客體物的存在，也只是沒有被認識到的空洞存在，就此



### 三、革命人生觀的征戰

對共產黨來說，不論無產階級群眾距離黨中央菁英有多麼遙遠，畢竟是工農勞動大眾賦予革命合法性的基礎。另一方面，對傳統帝國中國的社會而言，被治者與治者的鴻溝是一道無法跨越的鴻溝。共產主義首度以「科學」的語言將下層大眾的社會地位給指出來，以「階級」這個顯眼的詞彙給予工農大眾有革命的正當性，並且在理論的引導下，體認到在已進入世界體系的中國之內，他們現實存在的意義只能是被剝削的一群。瞿秋白進一步根據辯證唯物主義，將人的存在意義鑲嵌於一套必須去服從的自然鐵律。這個辯證法成爲掌握世界的終

---

來說，認識又是先於存在的。見孫善豪：〈馬克思主義的三位一體〉，《哲學雜誌》第14期（1995年11月），頁216-235；孫善豪：〈馬克思論意識型態〉，《台灣社會研究》第31期（1998年9月），頁119-146；孫善豪：〈「存有的前提」與「認識的前提」：論三種邏輯上可能的關係——以哲學史上實際出現過的三種主張爲例的探討〉，《國立政治大學哲學學報》第7期（2001年6月），頁181-200；孫善豪：〈馬克思主義者對「馬克思—黑格爾」關係的討論：一個思想史的考察〉，《揭諦》（南華哲學學報）第4期（2002年7月），頁131-164。不過，恩格斯對辯證法的理解則不是如此。他將馬克思用文字所表現出來的辯證法（否定的否定），視爲外在於思維（存在於馬克思的大腦中的辯證法）之上而能夠實際運作的客觀法則，也就是說，恩格斯是用馬克思思維辯證的成果去證明一個脫離於主體之外、而可以不斷地自我生成、自我發展的客觀世界的辯證法。於是世界自身的內在法則已經被辯證法揭示，辯證法不僅僅只是思維方式的表現，同時辯證法也凌駕客觀世界之上，整個客觀世界的生成變化都是辯證法的展現。自然辯證法成爲世界本身所內涵的法則，由它規定世界本身該怎麼運行。這時候客觀世界所不斷產生的新材料，並不是每一次重新研究的起點，反而是用來證明自然辯證法本身的正確性。因此恩格斯能引用當時的三大發現：細胞、自然科學中能量轉化定理以及達爾文演化論，證明辯證法的可靠性。透過恩格斯對馬克思主義的這個影響，唯物辯證法成爲一種從宇宙、物理世界到人類社會都一體適用的普遍法則，而人的自由就只能在對此必然邏輯的認識後才有，這樣便建構了一個無所不包的世界觀，可以用來解釋人類社會的歷史發展和其目的。對恩格斯自然辯證法的詳細分析，見 Leszek Kolakowski; P. S. Falla tran., *Main Currents of Marxism: its Origins, Growth, and Dissolutio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8), 376-408.

極法則，同時辯證法也為人們帶來統一且科學的世界觀。是以面對黨外眾多參與角逐社會輿論主導權的其他論述，瞿秋白就以唯物辯證法的世界觀來發動攻擊。

《新青年》再出發的時刻，中國知識界正開始進行一場科玄之爭（人生觀論戰）。<sup>55</sup> 雖然這場論戰的直接起源是1923年2月14日張君勱（1887-1969）在清華大學做一場題為「人生觀」的演講，論戰中胡適等人更重要的目標是針對1920年梁啟超（1893-1988）的《歐游心影錄》與1921年梁漱溟（1893-1988）的《東西文化及其哲學》而來的，二梁所宣佈的東方文明的復興在胡適看來實在是科學救國的最大論敵。就這點而論，科學論戰是東西文化論戰的餘緒。這亦表現在改頭換面後的《新青年》上。瞿秋白藉著討論東方文化與世界革命前途的文章，抨擊雙梁所要擁護的東方文化及道德倫常，都是迎合封建宗法社會的心理，科學正足以顛覆一切舊社會。<sup>56</sup>

雖然在馬克思主義者看來，代表封建社會的玄學派與資產階級的科學派雙方都是敵人，但就論戰策略來說，不妨暫時與不徹底的唯物主義科學派結盟。陳獨秀在1922-1923年間確實認為，為了對抗東方文化派有必要組成思想界的聯合戰線；<sup>57</sup> 瞿秋白這時亦曾致函胡適，希望上海大學能成為新文化運動的南方中心，並請胡適常加指導。<sup>58</sup>

<sup>55</sup> 相關研究與評論，見葉其忠：〈1923年「科玄論戰」：評價之評價〉，《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26期（1996年12月），頁179-234；羅志田：〈從科學與人生觀之爭看後五四時期對五四基本理念的反思〉，《歷史研究》1999年第3期，頁5-23；D.W.Y. Kwok, *Scientism in Chinese Thought, 1900-1950* (New Haven;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65), 135-160。

<sup>56</sup> 屈維它（瞿秋白）：〈東方文化與世界革命〉，《新青年》第10卷第1期（1923年6月15日），頁74-75。

<sup>57</sup> 關於思想界的聯合戰線，見章清：〈1920年代：思想界的分裂與中國社會的重組——對《新青年》同人「後五四時期」思想分化的追蹤〉，《近代史研究》2004年第6期，頁122-160。

<sup>58</sup> 〈瞿秋白致胡適函〉（1923年7月30日），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胡適紀念館，「北京檔」，HS-JDSHSC-1946-001。

就在1923年底科玄雙方暫時熄火之際，陳獨秀藉著為《科學與人生觀》一書作序之機發起馬克思主義的總攻。雖然陳獨秀批評兩派，指科學派的丁文江、胡適在立場上不夠徹底，但他主要火力是投向玄學家張君勱的九種人生觀。<sup>59</sup> 瞿秋白隨即跟上，以〈自由世界與必然世界〉一文重砲掩護。對於論戰的雙方，瞿秋白明快提出，問題「在於承認社會現象有因果律與否，承認自由意志與否」，其它的問題都是枝節。<sup>60</sup> 針對張、梁所區分的直觀感性及邏輯理性，<sup>61</sup> 瞿秋白站在唯物辯證法的高度上，直言無意識的自然現象和有意識、有人的主觀願望的社會現象，都有因果律，所謂「歷史的偶然，僅僅因為人類還不能完全探悉其中的因果」，若因此便認為歷史是主觀的，這只是因為「不知因果」而便說「沒有因果」。為了解因果，人就去探悉這些公律，從而利用公律，才能加以有規劃的行動，這就是「確知事實而能處置自如之自由」。空言意志自由，甚至為了立下意志自由而否認因果律，這都是自相矛盾的。<sup>62</sup>

同樣的，社會中每個個人的意識都是社會發展之果，梁啟超、張君勱主張人的情感、理想都只是各人的自由選擇，因而不能說社會人事和歷史都是有科學的因果關係，從而也就沒有所謂統一的人生觀，在瞿秋白看來這混淆了歷史與社會過程的根本原因。他搬出在《社會科學概論》建立的公式，解除命定論與意志論的衝突：社會現象的根本原因是從人和自然的互動中所產生的，也就是人的生產力狀態，所

---

<sup>59</sup> 陳獨秀：〈科學與人生觀序〉，《新青年》第10卷第2期，1923年12月20日，頁31-36。實際上陳獨秀的「唯物的歷史觀」過於機械。就辯證唯物主義而言，經濟唯物論、機械唯物論是比辯證唯心主義更危險，不僅表現出宿命論，甚會導向唯心主義的結論。只是在當下時機，馬克思主義內部不必就此深論。

<sup>60</sup> 瞿秋白：〈自由世界與必然世界〉，《新青年》第10卷第2期，1923年12月20日，頁37。

<sup>61</sup> 梁啟超：〈人生觀與科學〉，《科學與人生觀》（濟南：山東人民出版社，1997年），頁142。

<sup>62</sup> 瞿秋白：〈自由世界與必然世界〉，頁37-39。

以經濟關係受到它的限定，然後在這基礎上又有各種社會的政治制度、社會心理與社會思想。人們雖然能夠自由去選擇觀點，可是他的個性必然受到環境以及階級利益的限定，跳不出當代社會而以他「絕對的自己」觀點為立足點。在這之中便能看到一、兩個偉大個性的人，去察覺這種社會動向，超越階級而能「自由」地選擇了未來必然來到的社會，造成風潮，這就是「社會的有定論（determinisme）而不是宿命論（fatalisme）」<sup>63</sup>的主張。在今日的知識氛圍看來，若繼續追問，有定論與宿命論似乎差別不大，同樣都預設一條必然發生的未來之道，抹除人類歷史中的偶然性。但在瞿秋白而言，之所以要特別區別出社會有定論不同於宿命論，正因為後者並不知道因果的必然性，從而帶著神秘主義、宗教情懷或機會冒險主義看待社會，這無法提出一個有價值的終極目的。社會有定論則排除了偶然性，指向有意義的目的論。所以，瞿秋白宣稱，社會有定論是以科學的方法得出因果律，從而推測出將來之現實，這也就是現時的理想。故可見這種理想其實是社會發展的果，當這理想有了力量成為社會現象的因之後，實際上這個過程就是在社會因果律的支配下。總之科學的因果律不但足以解釋人生觀，而且足以變更人生觀，個性的先覺僅僅應此鬥爭需要而產生，所以是社會的或是階級的歷史工具而已。這種必然的公律方才開啟了從必然世界進於自由世界的境地。<sup>64</sup>

在瞿秋白的解釋下，人生觀問題就是人去認識必然世界與自由世界的問題，人生觀的「自由抉擇」可由「科學的」公律所揭示出來。在此一元論模式下，自然、社會與歷史的發展過程隱含朝向某種方向的目的論，任何相對主義與多元論者都因其思維模式不夠整全、並非融貫而相形見拙。<sup>65</sup> 馬克思主義者如此，科學派知識分子亦如此。胡

<sup>63</sup> 瞿秋白：〈自由世界與必然世界〉，頁43。

<sup>64</sup> 瞿秋白：〈自由世界與必然世界〉，頁43-47。

<sup>65</sup> 林毓生指出：五四時期知識分子所帶有的整體性的（totalistic）、全盤的反傳統主義的思想模式，乃是受到傳統儒家一元論主知主義的思維模式影響，因而在面向西方文化時，形成科學主義的一元論。見林毓生著，穆善

適在最後為科學派總結之際，就標舉一元論的唯物主義，<sup>66</sup> 如同瞿秋白的作法，從各種自然科學、生物學與社會科學的成就列舉出他的十誡；<sup>67</sup> 並認為自己所宣揚的「自然主義人生觀」，一方面可以明白自然界的因果律去解釋過去預測未來，另一方面也可以自由地運用智慧、創造新因以求新果，進而有了美感、詩意與道德的責任。<sup>68</sup> 胡適甚至以唯物論者的姿態回擊陳獨秀，將陳獨秀的經濟史觀倒轉成思想可以支配人生觀的唯心論方向。<sup>69</sup> 其實陳、胡雙方都心知肚明，縱使組成聯合戰線的同時也不能放棄爭奪思想界的領導權。打從五四開始，胡適與他所代言的杜威（John Dewey，1859-1952）實驗主義就盤據著思想界。《科學與人生觀》一書出版後，《申報》館在隔年又將胡適之前所作〈五十年來之世界哲學〉一文重刊成單行本，將實驗主義置於現代哲學最為前衛的地位。

爲了捍衛馬克思主義才是最徹底的唯物論，瞿秋白再次從側翼支援陳獨秀，批評實驗主義的科學觀只是帶著妥協性的市儈哲學。表

---

培譯：《中國意識的危機》（貴陽：貴州人民出版社，1988年）（譯自：Lin, Yü-sheng, *The Crisis of Chinese Consciousness: Radical Antitraditionalism in the May Fourth Era*）。

<sup>66</sup> 雖然胡適在科學主義的立場上是一元論，然而他並不相信有終極普遍的真理，或者可以說胡適是現代版的戴震，見金觀濤、劉青峰：〈試論中國式的自由主義——胡適實驗主義和戴震哲學的比較〉，收於劉青峰、岑國良編：《自由主義與中國近代傳統》（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2年），頁167-200；關於胡適的科學觀，見楊貞德：〈胡適科學方法觀論析〉，《中國文哲研究集刊》第5期（1994年9月），頁129-154。

<sup>67</sup> 胡適：〈《科學與人生觀》序〉，收入亞東圖書館編：《科學與人生觀》（上海：上海書店，1989年，據亞東圖書館1925年版影印），頁25-27。關於胡適如何挪用赫胥黎（Thomas Huxley，1825-1895）提出十條要旨，見江勇振：《舍我其誰：胡適，第二部：日正當中，1917-1927》（臺北：聯經出版公司，2013年），頁327-344。黃克武亦指出，胡適將赫胥黎所說的科學方法——「不可知論」（agnosticism）——擴張至倫理層面與形上領域，這種採取科學主義式的思維來詮釋赫胥黎「不可知論」，其實有儒、佛傳統思想的資源，見黃克武：〈胡適與赫胥黎〉，《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60期（2008年6月），頁43-83。

<sup>68</sup> 胡適：〈《科學與人生觀》序〉，頁28-29。

<sup>69</sup> 胡適：〈《科學與人生觀》序〉，頁31-33。

面上實驗主義的科學方法似乎非常革新，具有打擊舊禮教的意義，不去爭論宇宙最終真實，「注重現實生活的實用方面及積極性質」。<sup>70</sup> 它斷定現實生活裡的目的和願望完全依著人類的利益而定，「有幾種利益便有幾種真理」，看起來與「馬克思的互辯律的唯物主義（Le materialisme dialectique）很相近」。<sup>71</sup>

但實驗主義這種認為「一切真實只是為我們思想的方便」、「一切正義亦都是為我們行為的方便」而設立的主張，瞿秋白直接揭穿這是暗示短視近利的妥協主義，決不是革命哲學。<sup>72</sup> 以子之矛加以回擊，知識若只看實用性而不論能否符應現實，那麼宗教、上帝的概念最具有安定人心的實用功能了，而且可以幫助我們經營實際生活、減少人的痛苦，如此說來宗教的主張於人來說就是真實且必要的了。這無疑也是說，凡是一切類似催眠術的學說，只要人相信它有益，那麼就可以成為真實。之所以會導出如此荒謬的結論，真正的問題是，如果一切由主觀所引出的利益就是判斷真理的標準，這無疑會給出「唯心論的宇宙觀」的結論。<sup>73</sup>

是故，唯物辯證法只能承認，任何一種思想，若說它是有益的，那就只能從它是不是具有真實的、合乎客觀事實的能力來說。人的觀念、思想之所以時時刻刻都在變，是因為客觀的現實世界也時時在變。思想的積極精神必須反映現實裡變動不居之外的積極精神，而不是人們自己主觀的相信。這裡更深一層的意思就是指，真理必須由客觀世界來作保證，只有確保現象世界中的一切發展都有定律，且這些定律都可以作為人的行動指導方針，這時才有積極可言，<sup>74</sup> 否則就只是特定階級世界觀的反射。

---

<sup>70</sup> 瞿秋白：〈實驗主義與革命哲學〉，《新青年》第10卷第3期，1924年8月1日，頁12。

<sup>71</sup> 〈實驗主義與革命哲學〉，頁13、15。

<sup>72</sup> 〈實驗主義與革命哲學〉，頁14、16。

<sup>73</sup> 〈實驗主義與革命哲學〉，頁13。

<sup>74</sup> 〈實驗主義與革命哲學〉，頁15。

這裡的重點不是瞿秋白對杜威實用主義的理解與批評是否擊中要害，而是在他論述的背後，唯物辯證法成爲一個隱蔽的神。這裡瞿秋白點出一個重要問題所在，那就是現代中國在文化落後的局面下，中國的未來是要走如何的道路。

這一點牽涉到科玄論戰的弦外之音。科學與玄學派雙方實際上爭論的重點不是科學本身是什麼，而是中國要不要科學的問題。張君勱宣稱歐戰後物質文明的破產，更加證明了科學不是萬能，他巧妙地將管子的話轉用爲「知禮節而後衣食足，知榮辱而後倉廩實」，<sup>75</sup> 光明正大地對「科學」這一符號的權威性發動攻擊。對此胡適的反應最能說明此次論戰雙方的動機：

我們當這個時候，……正苦科學的勢力還不能掃除那迷漫全國的烏煙瘴氣——不料還有名流學者出來高唱「歐洲科學破產」的喊聲，……不要科學在人生觀上發生影響！信仰科學的人看了這種現狀，能不發愁嗎？能不大聲疾呼出來替科學辯護嗎？<sup>76</sup>

將西方近代工業社會的歷史發展視爲世界普世標準，在這樣的觀點下，胡適主張中國文明唯有走向科學的物質文明才有轉機。此處要緊的並不是去討論科學活動的本質，也較少地去討論科技層面的問題，更不是注意如何提倡、推進科學事業。對於科學一詞的內涵，是高舉科學的「精神」與科學的「方法」，賦予科學這一語詞以社會與文化的功能，是遠大於將科學視爲學術活動。

實際上胡適、丁文江等人對科學方法與科學精神的極端重視，更多的是受到生物進化論的強烈影響，胡適判定科不科學的標準，正是當時被轉化爲社會達爾文主義的進化論。<sup>77</sup> 正是這一點成爲瞿秋白批

<sup>75</sup> 張君勱：〈再論人生觀與科學並答丁在君〉，《科學與人生觀》，頁119。

<sup>76</sup> 胡適：〈《科學與人生觀》序〉，頁7-8。

<sup>77</sup> 胡適多年後更直接宣布，從生物進化論而來的實驗主義與起於黑格爾玄學

判以胡適為首的知識分子的基礎。以瞿秋白為代表的馬克思主義者，是從「階級」的立場來接受科學主義。如果只認為現代資本主義社會的科技發達就是科學本身的成果，是人類歷史的頂點，那麼這一點在更「科學」的馬克思主義洞見下只是資產階級的階級視域，沒有體認到就「階級」立場而言，歷史社會轉變的根本。如果說社會達爾文主義是正確的，那麼階級之間的剝削便可以輕易地合理化，先進帝國主義國家對殖民地民族的壓迫也可以視為文明化過程中的正常現象，文明的成果是應該由少數秀異者享用的。這根本就是不知道社會進化過程中質量互變的原理，也沒有體認到各種過渡形式中同化與複合的作用。

順此更進一步的討論，則是中國此後文明取捨的問題。對玄學派與各種形形色色的中國文化本位主義派來說，這是文明本體的取捨，生命的意義是在於人對宇宙終極的存在與宇宙心靈本質之間的把握，這一點只有充分地體現在具有普世價值的宋明心學上，因此反對科學主義，認為它並不適合今後中國文明開展的道路。對各種西化派來說，中西文明的歷史對比已經很明顯地昭示出科學（與民主）才真正具有普世價值，缺乏宰制客觀世界能力的中國決不能再容下玄學式的「忽而主義」。但對瞿秋白來說，他更將文明的取捨問題轉化為世界革命前途的選擇。

在〈現代文明的問題與社會主義〉一文中，針對各種討論東西文明的爭議，瞿秋白首先檢討「文明」是什麼，在馬克思主義的視域下，精神文明當然是物質文明的產物。可是這個可以增加人類對自然權威的技術文明，卻有兩個反對它的聲音，一者便是那些敵視技術文明、高唱著「向後轉」的古舊垂死階級；另一個則是比第三階級更新的受治階級，他們不能享受此文明，而想導此文明更進一步。<sup>78</sup>

---

方法辯證法之所以不相容，乃是因為達爾文主義的關係，見胡適：〈介紹我自己的思想〉，《新月》第3卷第4期，1931年，頁2-3。

<sup>78</sup> 瞿秋白：〈現代文明的問題與社會主義〉，《東方雜誌》第21卷第1期，



技術和機器發達的西方文明，雖能解放人類於自然權威之下，卻不能調節人與人之間的關係，也就是說資本主義時代的科學只能應用到人與自然關係上，卻不能進一步關照到人與人之間的社會現象上。所以說科學文明是帶有平等的民權主義性質，這說對了一半。一方面人人都有發明真理的權利，法律關係規定了人是平等的；但另一方面，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卻因發達的科學使人類社會的階級區隔更加絕對，思想上的平等只是空口白話。<sup>79</sup>

在暗示資本主義即將會有質上的變遷而進入下一個階段後，那麼社會主義的文明是什麼？並不是放棄技術十分發達的科學文明，而是要一起去克服社會現象裡的自然性、盲目性，求得各方面的諧和發展。人的勞動若是在圓滿的社會關係下，就只能引起人的快感和美感，展現出藝術性的技術文明。所以：

社會主義顛覆現代文明的方法於思想上便是充分的發展一切科學，——思想方面的階級鬥爭。社會主義的藝術文明是應當由這條路進行的，而且要人類自己努力。……社會科學中的有定論派亦並不因為發見了社會現象中的因果律，便應當聽天任運的讓資本主義照著資本家的心願去發展，卻反而可以在這資本主義發展的過程中決定更正確的鬥爭方略。<sup>80</sup>

瞿秋白表明，有定論者並不向看似無助的歷史宿命屈服，而是依靠受剝削者自我的能動性去創造屬於自己的歷史。然而唯物辯證法只保證必然性的來到，但是卻沒有告訴人們革命與反革命是如何地統一對立，又如何、何時、怎樣地從質到量產生飛躍的變化，以及這種變化又是怎樣地否定前一個革命行動與革命理論，而開展另一個新的革命

---

1924年1月，F1-F2。此文收入《瞿秋白論文集》時改題為〈現代文明的問題與共產主義〉，文中仍以「社會主義」一詞為主要題旨。

<sup>79</sup> 瞿秋白：〈現代文明的問題與社會主義〉，F5、F3。

<sup>80</sup> 瞿秋白：〈現代文明的問題與社會主義〉，F11。

起點。換言之，就是在具體客觀的環境中，中國到底要怎麼做革命。如果唯物辯證法並沒有對這些具體的實踐問題預先提供了解答，那麼，就唯有根據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原理去從事現實社會的具體分析。其中討論篇幅，已在本文之外。

#### 四、被「否定」的瞿秋白

時移勢轉，1927年4至7月，經歷國民黨的清黨、分共，國共統一戰線瓦解，中共組織遭受巨創。在重建革命活動的過程中，中國馬克思主義者有必要重新證明馬克思主義思想的正確性，解釋「大革命」實踐上失敗的原因，精煉、深化並普及理論，據以指導革命策略，反擊同樣運用馬克思主義語言的各式機會主義者。一方面，爲了證實馬克思主義關於社會與歷史概念的正確性，馬克思主義者藉著社會學與歷史學的學術研究，<sup>81</sup> 確認中國社會性質的現狀，分殊中國歷史發展的階段。理解過去歷史進程的秘密，掌握未來歷史發展必然的道路，歷史唯物主義就能指引現實革命實踐活動正確的敵我分析與策略。另一方面，在革命與反革命的陣營中，「一部分人提倡了辯證法唯物論的新世界觀」，並且作爲批判現實的武器，提出反帝反封建的普羅文學，<sup>82</sup> 直搗思想與意識形態領域。

這波翻轉文化霸權的運動，是1928年起首由左翼的創造社發動。他們指出過去轟轟烈烈的五四運動只是布爾喬亞的思想運動，沒有階級的立場，對於普羅階級毫無實效。<sup>83</sup> 即使現在新文化運動已發

<sup>81</sup> 從1928年起，知識分子分別進行中國社會性質論戰、中國社會史論戰、中國農村社會性質論戰的辯論，進一步的研究，見溫樂群、黃冬姬：《二三十年代中國社會性質和社會史論戰》（南昌：百花洲文藝出版社，2004年）；Arif Dirlik, *Revolution and History: The Origins of Marxist Historiography in China, 1919-1937*.

<sup>82</sup> 李初黎：〈十年來新文化運動的檢討〉，《解放》第1卷第24期，1937年11月20日，頁14-16。

<sup>83</sup> 彭康：〈五四運動與今後的文化運動〉，《流沙》第4期，1928年5月1

展為反對國民黨的人權運動，但新月派先生們沒有體認到文化運動也是政治鬥爭的一部分，國民黨的反動正是其階級表現。<sup>84</sup> 此後的文化運動，不能像五四般只是輸入外國思想來了事，而是要在明確的階級意識之下，確立解放無產階級的理論，以「辯證法的唯物論」清算一切的反動思想。<sup>85</sup>

有趣的是，或許爲了掩藏，有些作者主張辯證法不是唯物論獨有，而是邏輯的一種，可用以研究社會與自然，而不必相信唯物論；<sup>86</sup> 或者是貌似提供中立無害的介紹，並請讀者認明自己的主張與馬克思的不同；<sup>87</sup> 但其實他們都是使用自然辯證法的術語，在黑格爾與馬克思之間劃下絕對的分界，建築出科學社會主義。另有些作者只是抬出辯證法的名號，卻沒談到一定得提出的自然辯證法三大定律。<sup>88</sup> 同時，也出現介紹唯物論辯證法的譯作，包括來自日文、<sup>89</sup> 德文，<sup>90</sup> 以及俄文<sup>91</sup> 著作。這些著譯同樣沿用恩格斯所建立的套路，從哲學史上的唯心與唯物之爭出發，並以自然科學的成就佐證：只有唯

---

日，頁30。

<sup>84</sup> 彭康：〈新文化運動與人權運動〉，《新思潮》第4期，1930年2月28日，頁3。

<sup>85</sup> 彭康：〈五四運動與今後的文化運動〉，頁31。

<sup>86</sup> 劉若詩：〈辯證法是什麼〉，《現代中國》第2卷第3號，1928年9月16日，頁1。

<sup>87</sup> 申彥俊：〈唯物史觀辯證法之研究〉，《國民公論》第4號，1928年2月15日，頁15。

<sup>88</sup> 彭康：〈科學與人生觀：近幾年來中國思想界底總結算〉，《文化批判》第2號，1928年2月15日，頁21-47；彭康，〈思維與存在：辯證法的唯物論〉，《文化批判》第3號，1928年3月15日，頁13-27。

<sup>89</sup> 山川均著，施存統譯：〈辯證法的唯物論〉，《現代中國》第2卷第4號，1928年10月16日，頁1-13。

<sup>90</sup> 李鐵聲譯：〈辯證法的唯物論〉，《文化批判》第3號，1928年3月15日，頁28-49；李鐵聲譯：〈辯證法的唯物論（續）〉，《文化批判》第4號，1928年4月15日，頁29-51。按，譯者只提供譯自 *Theorie des Historischen Materialismus*，原作者與出版資料待進一步查考。

<sup>91</sup> 德博林著，李初黎譯：〈唯物辯證法精要〉，《文化批判》第5號，1928年5月15日，頁69-80。按，德博林現通譯爲德波林（Abram M. Deborin，1881-1963），俄國歷史與哲學家。

物的一元論才是徹底的哲學體系。

辯證法不只出現在左派刊物與各樣的社會科學著作，辯證法甚至開始向下滲入中小學生的讀物。舉例來說，第一代馬克思主義者楊東蓴（1900-1979）除了寫出給知識分子閱讀的作品外，<sup>92</sup> 他還運用辯證唯物主義的世界觀，寫出以小學生為對象的中國史讀本，雖然語言程度上可能不夠淺白。楊東蓴在前五課的開場文裡，從自然界的對立統一原則開始，延伸至人類社會，並向他的小讀者指出：「過去的知識給予我們一種支配未來的能力」。<sup>93</sup> 在經歷小學歷史課本潛移默化地放送後，進入中學生階段，不只學習到「當作認識論的辯證法」，<sup>94</sup> 並且還有社會科學家提供「適合」閱讀的進階參考著作。<sup>95</sup> 面對辯證法的橫流肆虐，親國民黨的哲學家譚輔之（生卒年不詳）如此哀嘆：

1928 至 1932 年一短短時期中，除了普羅文化的口號而外，便是唯物辯證法和唯物史觀之介紹。這是新書業的黃金時代。在這時，一個教員或一個學生，書架上如果沒有幾本馬克斯的

<sup>92</sup> 楊東蓴：〈從自然科學的唯物論到辯證的唯物論〉，《民鐸雜誌》第 10 卷第 5 號，1929 年 11 月，頁 2-10。

<sup>93</sup> 楊東蓴：〈中國史讀本 第一課 萬物時時在變化著〉，《小學生》第 6 卷第 6 期，1936 年，頁 17-20；楊東蓴：〈中國史讀本 第二課 變化的法則也適用於人類社會嗎？〉，《小學生》第 6 卷第 7 期，1936 年，頁 14-17；楊東蓴：〈中國史讀本 第四課 英雄造時勢時勢造英雄〉，《小學生》第 6 卷第 9 期，1936 年，頁 14-17；楊東蓴：〈中國史讀本 第五課 我們為什麼要學歷史呢？〉，《小學生》第 6 卷第 10 期，1936 年，頁 10-12。按，第三課文本未收集到。「過去的知識給予我們一種支配未來的能力」一句，見〈第五課〉，頁 12。

<sup>94</sup> 劉叔琴：〈當作認識論的辯證法〉，《中學生》第 31 期，1933 年 1 月，頁 211-227。

<sup>95</sup> 陳高備：〈適合中學生閱讀的六本社會科學書〉，《中學生》第 22 期，1932 年 2 月，頁 7-16。該文開出六本書，前兩本都有介紹辯證法，分別是楊劍秀：《社會科學概論》（上海：現代書局，1929 年）。陳高備提示，這本書前三章是總論、辯證法的唯物論、社會，能把握社會科學根本原理與方法。第二本是〔德〕塔爾海瑪 A. Thalheimer 著，李達譯：《現代世界觀》（上海：崑崙書店，1929 年）。陳高備建議先讀 10、11 兩章「辯證法」，最適合初學者。

書，總要被人瞧不起了。……1931 至 1935 年……新哲學……已由民間爬進了大學，甚至在課程上都列有辯證法那樣的科目。如口裡不講幾句辯證法或唯物論，一定不受學生歡迎。<sup>96</sup>

當然，並不是沒有「資產階級」學者出面衛戰，作為當時第一流的政治學者羅隆基（1896-1965），就依照辯證法「正」、「反」、「合」的程序直指其理論本身的矛盾。簡單地說，依照辯證法的應用，在共產主義所說的無階級的社會裡，必然會有新興階級的興起，否則就是違反辯證法，而這卻與共產黨人的宣傳相違。<sup>97</sup> 哲學家張東蓀（1886-1973）則是直接發動討伐，試圖將這個「闖入哲學界」的幽靈驅逐出哲學淨土，<sup>98</sup> 由此引發 1930 年代一場名為唯物辯證法論戰。<sup>99</sup> 如同近十年前科學派知識分子發動人生觀論戰征服玄學派，中共馬克思主義者也在這場論戰中擊敗張東蓀與那些試圖捍衛「純正」馬克思主義的托派。

在這過程中，正統中共馬克思主義者引入當時蘇聯最新潮的版本。同樣親至蘇聯接受過理論洗禮的沈志遠（1902-1965），以四個階段概括出在不斷地歷經清除與捍衛之後，那是以米丁（Mark Borisovich Mitin, 1901-1987）為首的正統派，<sup>100</sup> 米丁對馬克思列寧

---

<sup>96</sup> 譚輔之：〈最近的中國哲學界〉，《文化建設》第3卷第6期，1937年3月，頁83。同時間得出類似觀察的還有蔡尚思、郭湛波，分見蔡尚思：〈三十年來的中國思想界〉，《天籟》第25卷第2期，1936年11月，頁131；郭湛波：《近五十年中國思想史》（上海：上海書店，1989年，據人文書店1936年版影印），頁196。

<sup>97</sup> 羅隆基：〈論共產主義——共產主義理論上的批評〉，《新月》第3卷第1號，1931年，頁16。

<sup>98</sup> 張東蓀：〈唯物辯證法之總檢討〉，1934年，收入張東蓀編：《唯物辯證法論戰》（臺北：帕米爾書店，1980年），頁135。

<sup>99</sup> 相關的前因後果與研究，見耿彥君：《唯物辯證法論戰研究》（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5年）。

<sup>100</sup> 沈志遠：〈蘇俄哲學思潮之檢討〉，《中山文化教育館季刊》創刊號，1934年8月，頁132-155。

主義的闡釋成爲中國黨人所依循的新一代權威。<sup>101</sup> 翻譯之外，黨人亦從事通俗普及性的撰著與艱深專門的寫作，如李達（1890-1966）的《社會學大綱》和艾思奇（本名李生萱，1910-1966）的《大眾哲學》、《思想方法論》、《哲學與生活》等。<sup>102</sup> 經由論戰、翻譯與中國化的過程裡，如同蘇聯的翻版，唯物辯證法哲學內部清算出數種不正確的辯證法，包括布哈林、普列漢諾夫、德波林（Abram M. Deborin，1881-1963）。<sup>103</sup> 由於列寧曾指出：「可以把辯證法簡要地規定爲關於對立面的統一的學說」，<sup>104</sup> 因此過於強調量變到質變的普列漢諾夫體系，就與最高權威抵觸。其次，普列漢諾夫對於辯證法的闡釋，沒有提升到列寧反映論（reflexion）的層次，<sup>105</sup> 遂有將認識論降級、導致認識論與辯證法出現對立的嫌疑。<sup>106</sup> 最後，瞿秋白曾在《現代社會學》裡，毫無保留地呈現布哈林「均勢論」的觀點。如此一來，顯示出前一輩的瞿秋白在象徵資本的積累上已屬待吞併的一方。就黨內現實政治走向來說，隨著瞿秋白在黨內權力鬥爭的失敗，共產國際扶持比他更可信任的黨人取代之。<sup>107</sup> 這或許是瞿秋白在接近生命末期時，是與魯迅一起在左翼文學運動上進行合作，而並未參與辯證法論戰的原因。

得益於後見之明，我們知道在中國真正掌握馬克思主義最終詮釋

---

<sup>101</sup> 關於1930年代米丁流派所建構之「新哲學」與傳入中國的過程，見：Nick Knight, *Marxist Philosophy in China: From Qu Qiubai to Mao Zedong, 1923-1945*, 71-92.

<sup>102</sup> 詳細的情況，見許全興、陳戰難、宋一秀：《中國現代哲學史》（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年），頁228-241。

<sup>103</sup> 艾思奇：〈廿二年來之中國哲學思潮〉，《中華月報》第2卷第1期，1934年3月，頁B44。

<sup>104</sup> 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史達林著作編譯局譯：《列寧哲學筆記》（北京：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頁192。

<sup>105</sup> 沈志遠：〈蘇俄哲學思潮之檢討〉，頁136。

<sup>106</sup> 德博林著，李初黎譯：〈唯物辯證法精要〉，《文化批判》第5號，1928年5月15日，頁77-78。按，德博林即是德波林。

<sup>107</sup> 張秋實：《解密檔案中的瞿秋白》（北京：東方出版社，2011年），頁381-442。

權的是毛澤東。一般認為，毛澤東對辯證唯物主義的深化、進而提出毛澤東主義的命題，關鍵是他的〈實踐論〉。它是唯物辯證法的認識論，指出人的認識過程是從實踐開始，經歷「認識的感性階段」飛躍到「認識的理性階段」，然後以此再回到實踐，進行下一個從理性的認識到革命的實踐之飛躍。<sup>108</sup> 人的實踐與認識就在這種螺旋上升的過程中一直向上攀升，只要物理世界是不斷生成變化的，那麼透過客體—主體—客體不斷循環的過程，人對於真理的認識也就是不斷地完善。

與瞿秋白相比，毛澤東彰顯出認識的能動作用，能在思維與存在之間納入人的主觀能動性，從而為黨的革命事業製造出有待超越揚昇的矛盾的主要方面。<sup>109</sup> 同時，藉著〈矛盾論〉，毛澤東以此總結過去革命的進程，找到黨史內部過去曾產生的機會主義與冒險主義這兩種內因。<sup>110</sup> 由於「矛盾論」與「實踐論」對黨史作了「正確」的分判，過去失敗的路線，被當成是對正確路線的反向命題。也就是說，正確的路線是在錯誤路線的襯托之下，更顯得出其正確性。於是瞿秋白這位曾經犯下左傾錯誤的重要領導人，在辯證法的歸納下，也就有了他的歷史定位。於是在各類傳記、黨史與論文中，一方面，就毛澤東的新民主主義論所規定的歷史進程，可以看到瞿秋白從五四啟蒙主義的思想轉向了科學的社會主義思想，彰顯他追求真理的心路歷程，以及看到了一位現代中國革命先知的形成，並成為黨的理論家。另一方面，由於瞿秋白所執行的路線，曾經違背了在黨史中所規定的革命路線，因此也要指出瞿秋白在實踐與認識導致左傾盲動主義與調和主義

---

<sup>108</sup> 毛澤東：〈實踐論〉，《毛澤東選集》（北京：北京人民出版社，1966年）卷1，頁259-269。

<sup>109</sup> 學界關於毛澤東思想的研究十分豐沛，此處從辯證唯物主義的脈絡討論矛盾論與實踐論，可見 Nick Knight, *Marxist Philosophy in China: From Qu Qiubai to Mao Zedong, 1923-1945*, 171-195.

<sup>110</sup> 分見〈矛盾論〉，《毛澤東選集》卷1，頁285、288-289。

路線的根源。<sup>111</sup>

黨史清算與整風運動輔助毛澤東去教育黨人要知道這個過去，理解錯誤的來源，從而以哲學家的口吻提出這種思維與存在的黨性原則。但是這麼形上的辯證法，並沒有告訴人們實際狀況中辯證法是怎麼運作。這個解釋權只有身為領導人才有權作最後裁判。於是，辯證法的必然性保證了黨領導人的個人自由意志。

## 結論

五四初起，由於政治訴求的失敗，知識青年遂投入如新村運動與工讀互助團這類組織，試圖透過集體力量來從事救國的實際行動。<sup>112</sup> 全國學生團體更辦了四百餘種白話報刊，使得原先只局限於北大同人刊物的《新青年》所倡導的新思潮，演變成全國性的運動。<sup>113</sup> 只有當改造社會的熱情為這些活動的失敗所中斷後，才促使知識分子與學生將目光轉向另一種更激進的社會主義——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由於歷史條件所限，黨人一開始只認識到唯物主義的一面，因而無法在主體能動與結構限制之間理清對手的詰難。隨後在俄人的幫助下邁向布爾什維克化，開始從事職業革命家的事業，包括理論的純化。

對布爾什維克黨人而言，馬克思列寧主義不只是提出一個與現存一切「資產階級」意識形態徹底決裂的政治方案，同時還是一個融貫的世界觀。這個以辯證法為核心的世界觀，既顯示現有世界秩序的衰敗，同時預示一個超越階級利害、種族區別的更高文明的到來。辯證法向黨人與勞動大眾許諾一個嶄新的人類歷史時刻，指出現實生活中壓迫與不幸的來源。為了改變生存命運，辯證法提供從日常生活到政

---

<sup>111</sup> 瞿秋白的這個黨史地位，可見於如註釋11所提到的各類傳記、黨史與論文。

<sup>112</sup> Arif Dirlik, *The Origins of Chinese Communism*, 90-94.

<sup>113</sup> 王奇生：〈新文化是如何「運動」起來的——以《新青年》為視點〉，《近代史研究》2007年第1期，頁21-40。



治鬥爭的革命策略。所有這一切，都已由科學的必然法則所保證。

於是，依照辯證唯物主義，瞿秋白對中國黨人指出，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最終目的是共產主義社會的建立，因為這個目的，所以引發了研究資本主義和人類過去社會歷史的興趣，導出政治經濟學與唯物史觀，最後發現辯證唯物主義的必然性。自然科學與生物學的最新發現確定世界是以唯物為起點，是以整個人類思想史是在唯物主義對唯心主義的作戰，最後以辯證唯物主義的勝利告終，它總結出自然辯證法三大公式，自然世界與人類社會在此法則下依循朝向一個不斷完滿的目的進化，從而保證一切自然界和人類社會的必然性，人類的自由王國只能存在於必然王國的實現之後。在這個哲學體系裡，雖然處於目的論的結構制約，但人有著有限的主觀能動性。如果人的自由意志必須去服從歷史必然法則，這就表示人是積極地去參與歷史的來到。共產主義的實現，需要經過資本主義社會，以及一種「過渡」到共產主義社會的特殊社會形式，它必須採取無產階級專政的方法才有可能實現這個過渡。那麼，為了實現這個人類歷史必然經過的階段，無產階級不是等待歷史的來到，因為那將落入等待的機會主義。而無產階級要如何奪取資產階級在各方面的「霸權」呢？列寧的經驗告訴人們，無產階級要與資產階級爭奪領導權，要在參與資產階級革命的時候教育群眾，將一切領域的鬥爭都提升到政治領域層面。

瞿秋白將辯證唯物主義引介至中國，促使中國馬克思主義者認識到，這些在歐洲與俄國馬克思主義者所曾經爭論過的問題。經由參與論戰，瞿秋白為黨人展示，當時中國知識界關於文明取向、人生觀問題的討論，其實都是引述已被擊敗的西方資產階級意識形態作為論述的依據，中國黨人只要依照辯證唯物主義的論式，就可討伐那些即將埋葬於歷史的一方。

既然辯證法是凝聚黨人行動力的世界觀，它的正確詮釋就只能掌握在黨的領導人之手，也只能限於一個版本。當瞿秋白在1928年因盲動路線被逐出權力中心後，他也就失去詮釋辯證法的能力，並為辯證法推向否定的一方。

## 徵引書目

## 一、檔案、史料、文集

〈瞿秋白致胡適函〉，1923年7月30日，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胡適紀念館，「北京檔」，HS-JDSHSC-1946-001。

山川均著，施存統譯：〈辯證法的唯物論〉，《現代中國》第2卷第4號，1928年10月16日，頁1-13。

毛澤東：《毛澤東選集》卷1，北京：北京人民出版社，1966年。

申彥俊：〈唯物史觀辯證法之研究〉，《國民公論》，第4號，1928年2月15日，頁13-16。

列寧，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史達林著作編譯局譯：《列寧哲學筆記》，北京：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7月，第2版。

艾思奇：〈廿二年來之中國哲學思潮〉，《中華月報》第2卷第1期，1934年3月，頁B41-B45。

李大釗：〈我的馬克思主義觀（上）〉，《新青年》第6卷第5期，1919年5月，頁521-537。

李初黎：〈十年來新文化運動的檢討〉，《解放》第1卷第24期，1937年11月20日，頁15-17。

李鐵聲譯：〈辯證法的唯物論〉，《文化批判》第3號，1928年3月15日，頁28-49

李鐵聲譯：〈辯證法的唯物論（續）〉，《文化批判》第4號，1928年4月15日，頁29-51。

沈志遠：〈蘇俄哲學思潮之檢討〉，《中山文化教育館季刊》創刊號，1934年8月，頁132-155。

亞東圖書館編：《科學與人生觀》，上海：上海書店，1989年，上海亞東圖書館1925年版影印。

屈維它（瞿秋白）：〈東方文化與世界革命〉，《新青年》第10卷第1

- 期，1923年6月15日，頁67-86。
- 阿多那斯基著，石夫節譯：〈馬克思主義辯證法底幾個規律〉，《新青年》第10卷第3期，1924年8月1日，頁46-50。
- 胡適：〈介紹我自己的思想〉，《新月》第3卷第4號，1931年，頁1-18。
- 恩格斯：《反杜林論》，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編譯局編：《馬克思恩格斯選集》卷3，北京：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6月，第2版。
- 恩格斯：《路德維希·費爾巴哈和德國古典哲學的終結》，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編譯局編：《馬克思恩格斯選集》卷4，北京：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6月，第2版。
- 秦孝儀主編：《總統蔣公大事長編初稿》第10卷，臺北：中國國民黨黨史委員會，1978年。
- 馬克思，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編譯局譯：《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北京：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3版。
- 張君勱、丁文江等：《科學與人生觀》，濟南：山東人民出版社，1997年。
- 郭湛波：《近五十年中國思想史》，上海：上海書店，1989年，人文書店1936年版影印。
- 陳高傭：〈適合中學生閱讀的六本社會科學書〉，《中學生》第22期，1932年2月，頁7-16。
- 陳獨秀：〈科學與人生觀序〉，《新青年》第10卷第2期，1923年12月20日，頁31-36。
- 彭康：〈五四運動與今後的文化運動〉，《流沙》第4期，1928年5月1日，頁22-32。
- 彭康：〈思維與存在：辯證法的唯物論〉，《文化批判》第3號，1928年3月15日，頁13-27。

- 彭 康：〈科學與人生觀：近幾年來中國思想界底總結算〉，《文化批判》第2號，1928年2月15日，頁21-47。
- 彭 康：〈新文化運動與人權運動〉，《新思潮》第4期，1930年2月28日，頁1-23。
- 普列漢諾夫，中國人民大學編譯室譯：《普列漢諾夫哲學著作選集》第1-3卷，北京：三聯書店，1962年。
- 楊東蓀：〈中國史讀本 第一課 萬物時時在變化著〉，《小學生》第6卷第6期，1936年，頁17-20。
- 楊東蓀：〈中國史讀本 第二課 變化的法則也適用於人類社會嗎？〉，《小學生》第6卷第7期，1936年，頁14-17。
- 楊東蓀：〈中國史讀本 第五課 我們為什麼要學歷史呢？〉，《小學生》第6卷第10期，1936年，頁10-12。
- 楊東蓀：〈中國史讀本 第四課 英雄造時勢時勢造英雄〉，《小學生》第6卷第9期，1936年，頁14-17。
- 楊東蓀：〈從自然科學的唯物論到辯證的唯物論〉，《民鐸雜誌》第10卷第5號，1929年11月，頁1-10。
- 蒲列哈諾夫（Plekhanov）著，鄭超麟譯：〈辯證法與邏輯〉，《新青年》第10卷第3期，1924年8月1日，頁38-46。
- 劉叔琴：〈當作認識論的辯證法〉，《中學生》第31期，1933年1月，頁211-227。
- 劉若詩：〈辯證法是什麼〉，《現代中國》第2卷第3號，1928年9月16日，頁1-8。
- 德博林著，李初黎譯：〈唯物辯證法精要〉，《文化批判》第5號，1928年5月15日，頁69-80。
- 蔡尚思：〈三十年來的中國思想界〉，《天籟》第25卷第2期，1936年11月，頁119-156。
- 鄭惠、瞿勃編：《瞿秋白譯文集》第2冊，南京：譯林出版社，1999年。

- 瞿秋白：〈世界的社會改造與共產國際（共產國際之黨綱問題）〉（1923年1月），《新青年》第10卷第1期，1923年6月15日，頁12-36。
- 瞿秋白：〈自由世界與必然世界〉，《新青年》第10卷第2期，1923年12月20日，頁36-47。
- 瞿秋白：〈現代文明的問題與社會主義〉，《東方雜誌》第21卷第1期，1924年1月，F1-F11。
- 瞿秋白：〈實驗主義與革命哲學〉，《新青年》第10卷第3期，1924年8月1日，頁10-16。
- 瞿秋白：《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論篇）第8卷，北京：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年—1998年。
- 瞿秋白著，瞿勃、杜魏華整理：《瞿秋白論文集》，重慶：重慶出版社，1995年。
- 羅隆基：〈論共產主義——共產主義理論上的批評〉，《新月》第3卷第1號，1931年，頁1-22。
- 譚輔之：〈最近的中國哲學界〉，《文化建設》第3卷第6期，1937年3月，頁82-90。

## 二、中文研究著譯專書：

- Alex Callinicos 著，簡守邦譯：《社會理論思想史導論》，臺北：韋伯文化出版公司，2004年。（Alex Callinicos, *Social Theory: An Historical Introduction.*）
- 丁守和：《瞿秋白思想研究》，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
- 石川禎浩著，袁廣泉譯：《中國共產黨成立史》，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6年。
- 江勇振：《舍我其誰：胡適，第二部：日正當中，1917-1927》，臺北：聯經出版公司，2013年。
- 利興民主編：《馬克斯主義哲學在中國的傳播和發展》，廣州：廣東高

- 等教育出版社，1988年。
- 李其駒、王炯華、張耀先主編：《馬克思主義哲學在中國——從清末民初到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
- 李博著，趙倩、王草、葛平竹譯：《漢語中的馬克思主義術語的起源與作用：從詞彙——概念角度看日本和中國對馬克思主義的接受》，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3年。（Wolfgang Lippert, *Entstehung und Funktion einiger chinesischer marxistischer Termini: der lexikalisch-begriffliche Aspekt der Rezeption des Marxismus in Japan und China.*）
- 林毓生著，穆善培譯：《中國意識的危機》，貴陽：貴州人民出版社，1988年。（Lin, Yü-sheng, *The Crisis of Chinese Consciousness: Radical Antitraditionalism in the May Fourth Era.*）
- 耿彥君：《唯物辯證法論戰研究》，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5年。
- 張東蓀編：《唯物辯證法論戰》，臺北：帕米爾書店，1980年。
- 張秋實：《解密檔案中的瞿秋白》，北京：東方出版社，2011年。
- 莊福齡主編：《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傳播史》，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88年。
- 許全興、陳戰難、宋一秀：《中國現代哲學史》，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年。
- 曾樂山：《馬克思主義哲學的中國化及其歷程》，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1991年。
- 溫樂群、黃冬姪：《二三十年代中國社會性質和社會史論戰》，南昌：百花洲文藝出版社，2004年。
- 鄧中好：《瞿秋白哲學研究》，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1992年。
- 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聯共（布）中央特設委員會編：《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莫斯科：外國文書籍出版社，1949年。

### 三、中文期刊

- 王奇生：〈新文化是如何「運動」起來的——以《新青年》為視點〉，《近代史研究》2007年第1期，頁21-40。
- 金觀濤：〈〈實踐論〉與馬列主義儒家化〉，《〈香港〉二十一世紀》總第20期，1993年12月，頁19-28。
- 金觀濤：〈中國文化的烏托邦精神〉，《〈香港〉二十一世紀》總第2期，1990年12月，頁17-32。
- 金觀濤：〈唯物史觀與近代中國傳統〉，《〈香港〉二十一世紀》總第33期，1996年2月，頁53-61。
- 金觀濤、劉青峰：〈中國個人觀念的起源、演變及其形態初探〉，金觀濤、劉青峰：《觀念史研究：中國現代重要政治術語的形成》，香港：香港中文大學當代中國文化研究中心，2008年，頁147-174。
- 金觀濤、劉青峰：〈試論中國式的自由主義——胡適實驗主義和戴震哲學的比較〉，劉青峰、岑國良編：《自由主義與中國近代傳統》，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2年，頁167-200。
- 孫善豪：〈「存有的前提」與「認識的前提」：論三種邏輯上可能的關係——以哲學史上實際出現過的三種主張為例的探討〉，《國立政治大學哲學學報》第7期，2001年6月，頁181-200。
- 孫善豪：〈馬克思主義的三位一體〉，《哲學雜誌》第14期，1995年11月，頁216-235。
- 孫善豪：〈馬克思主義者對「馬克思—黑格爾」關係的討論：一個思想史的考察〉，《揭諦》（南華哲學學報）第4期，2002年7月，頁131-164。
- 孫善豪：〈馬克思論意識形態〉，《臺灣社會研究季刊》第31期，1998年9月，頁119-146。
- 章清：〈1920年代：思想界的分裂與中國社會的重組——對《新青年》同人「五四時期」思想分化的追蹤〉，《近代史研究》2004

- 年第6期，頁122-160。
- 黃克武：〈胡適與赫胥黎〉，《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60期，2008年6月，頁43-83。
- 黃克武：〈蔣介石與賀麟〉，《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67期，2010年3月，頁17-58。
- 楊貞德：〈胡適科學方法觀論析〉，《中國文哲研究集刊》第5期，1994年9月，頁129-154。
- 葉其忠：〈1923年「科玄論戰」：評價之評價〉，《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26期，1996年12月，頁179-234。
- 歐陽軍喜：〈論抗戰時期《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在中國的傳播及其對中國共產黨宣傳工作的影響〉，《黨史研究與教學》2008年第2期，頁22-30。
- 歐陽哲生：〈《新青年》編輯演變之歷史考辨——以1920-1921年同人書信為中心的探討〉，《歷史研究》2009年第3期，頁80-104。
- 羅志田：〈從科學與人生觀之爭看後五四時期對五四基本理念的反思〉，《歷史研究》1999年第3期，頁5-23。

#### 四、外文著作

- Dirlik, Arif, *Revolution and History: The Origins of Marxist Historiography in China, 1919-1937*.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8.
- Dirlik, Arif, *The Origins of Chinese Communism*. Oxford: University of Oxford Press, 1989.
- Kellner, Douglas, "Western Marxism," in Austin Harrington ed., *Modern Social Theory: An Introduction*. Oxford, U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 Knight, Nick, *Marxist Philosophy in China: From Qu Qiubai to Mao Zedong, 1923-1945*. Dordrecht: Springer, 2005.



---

Kolakowski, Leszek; Falla, P. S. tran., *Main Currents of Marxism: its Origins, Growth, and Dissolutio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8.

Kwok, D.W.Y., *Scientism in Chinese Thought, 1900-1950*. New Haven;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65.

Meisner, Maurice, *Li Ta-chao and the Origins of Chinese Marxism*.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7.

Neil Harding, *Leninism*. Durham, N.C.: Duke University Press, 1996.